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331期

【思想文化】

1 “党性”三题/尉天纵

【百年国史】

10 上山下乡运动中革命、代际关系和毛时代的媒体角色/ 孙沛东（美）

23 绘本特殊年代——漫笔童年饥饿（1959—1966）（二）/墨娃

【评论】

33 “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72）/李南央（美）

——关不进监狱的母亲河的愤怒

【序跋】

35 百年歌声：简析词曲中的近现代中国·序言/马昌海

【怀人】

41 三十二年的情谊——纪念我的阿姨徐阿凤/张保和（美）

【述往】

51 竹海葱茏——童年记忆（一）/万润南（法）

62 吃瓜子的故事/言真

65 我所参加的文化大革命（五）/杜钧福

【书讯】

76 胡宗式、章铎 著《北京大学文革史权》（上卷）在美出版

【资料】

北京大学社教运动资料选登

80/1. 1964年7月23日晚聂元梓向张磐石谈话

82/2. 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简报（11—15）

【读者来信】

94/1. 杜钧福说明 2. 郭予庆纠错

【补白】

22 邓小平的笑/刘衡

【本刊声明】

【思想文化】

“党性”三题

尉天纵

中共领导层控制党员的重要手段，就是要求他们必须养成并坚持所谓“党性”。一九四二年，由毛泽东主导长达两年多的延安整风，即为达此目的而开展。这种党性一经养成，中共领导层就可以将他们任意驱使。当年正是因为训练出了一大批这样的党员，所以才能打下天下。在夺取了政权后，又是依靠这些人镇压异己，屠戮同胞，使自己稳坐江山。可见党性是中共领导层的命根子。

那么，什么是中共的党性？

一、党性就是兽性

兽性的表现就是好斗。中共信奉的是“斗争哲学”，建党伊始，就不停地斗，和“敌人”斗，和“朋友”斗，也和自己人斗。毛泽东更是把“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作为自己终生的行动指南。中共党员不是去斗别人就是被别人斗，多数情况是二者兼而有之。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说了实话被毛泽东斗倒，可是此前他也斗过刘伯承、萧克、粟裕，而且绝不手软。

即使像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党魁，在爬上权力顶峰前也都被别人斗过，邓小平更是三起三落。在中共党内，谁要是斗争不积极，那就是党性不纯洁的表现，必遭整肃，甚至开除。

兽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残暴、血腥。对自己制造成“敌人”，残酷斗争，疯狂迫害，不但要肉体消灭，还要用各种下流手段侮辱其人格。可见党性和人性是完全背离的，党性一旦养成，人性必然泯灭。在中共党内，“人性”和“人道”长期以来一直被列为高度禁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胡乔木，邓立群等“笔杆子”还在对“人道主义”“人性论”大张挞伐，连曾被称为“文艺沙皇”的周扬也受到批判，郁郁而终。

正是在这种兽性的驱使下，当年为报复顾顺章一个人，竟用斧子砍死他全家。一九四七年在“老区”的土改中，不仅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还用极其残酷，灭绝人性的手段对他们进行人身消灭。当时“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

部分中农约二十五万人”（1950年刘少奇对苏联大使的谈话）。山东在两个月内就杀了三四万，冀鲁豫则杀了十万之数。有的是斗争会上当场用乱棍打死。有的开膛剖肚。有的被“砸核桃”（用石头把人的头当场砸碎）。有的被吊在“望蒋楼”上吊死，或剪断绳子让其摔死。有的人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直到活活被刮死。还有的地方把地主的小孩活埋或活活摔死。就连一些在抗战时期和中共合作过的“开明士绅”也未能幸免。有一个开明士绅王作相被打死以后开膛破肚，尸体被扔进黄河。不要以为这些血淋淋的兽性都是农民的“自发行为”，须知这些都是在中共高层纵容下干出来的。刘少奇当年就说过“杀他千万地主有什么不好？”“精神上不要可怜地主，不要以多杀了地主不得了……多杀一点有好处的话，那就多杀！”“地主杀我们一个人，我们要杀他二十个人！”东北松江省委负责人张秀山说“农民对地主的打击越激烈越人道”。冀热察区委书记刘道生则说：“杀不是错，不杀才是错”。面对着这股兽性狂潮，毛泽东则说他“从未这样愉快过。过左了的，道个歉就是了”。中共的领导者之所以不断发动农民疯狂地杀人，就是要激发兽性，使他们双手沾上血，这样干起革命来才会态度坚决，“义”无反顾（参阅杨奎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第一册）。

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了政权，杀起人来更加肆无忌惮。在镇反运动中，毛泽东就一再指示要“大杀”几批。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他指示上海方面“在今年一年内，恐怕要处决二千人”。一月二十二日，他又指示广东方面“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在这样一再催逼下，各地大开杀戒。为了完成杀人指标，就滥捕滥杀。有些地方要杀的人连出身、简历、年龄等基本材料都没有，送到公安局的“犯人”有的仅写一个“坏”字。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国民党起义官兵被杀，一些曾帮助过中共的国民党党政人员也被杀。就连一些中共的地下党员也被杀掉。“进步教授”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曾追随中共并策划过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既无民愤，亦无血债，也在镇反中被杀掉。而毛泽东的态度则是“人民说（用“人民”来掩饰自己的意图是毛的惯用伎俩——笔者注）杀反革命比下场雨还痛快”，“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参阅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第一册）

到了文革时期，这种兽性更是发泄到了极致。一大批按照党性标准训练出来

的红卫兵（袁伟时教授称为“喝狼奶长大，打的人不在少数）。还强迫他们的老师吃粪便、吃痰、喝墨水、戴高帽、剃阴阳头、挂牌、“坐喷气式”，凡是能想得出来的侮辱和摧残人类的手段都用上了。而这一切则是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启发。对于一些坚守良知，坚持独立思想的人，像张志新、李九莲等，不但要消灭其生命，还要在枪毙前先扭断颈项，割断喉管，或用竹签把舌头和下腭穿透。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因不堪凌辱而自杀，死后竟被开膛破肚，看看肚里是不是藏着发报机，而那个指使对她开膛破肚的军代表还无耻地说“老子今天终于看到你的全身了”。（这个人叫刘万泉，四川宜宾人，后来长期在公安机关工作。现在还“安居”南昌）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些地方在“革委会”或其他政权机关的指使和教唆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

北京郊区大兴县，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传达了当时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指示后，于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全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了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才三十天，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其中大辛庄在八月三十一日夜里，一口气杀了一百多人。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则踩着一条腿劈开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个人就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

湖南道县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到十月十七日共死亡四千五百一十九人，其中被杀四千一百一十三人，逼迫自杀三百二十六人。杀人的手段有枪杀、刀杀、沉水、铡死、丢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绳勒、火烧、摔死等十几种。死者的尸体扔在河中，以致道县人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吃豆腐（做豆腐的水是从河里打上来的）（参阅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而广西则不但杀人，还要吃人心肝。武宣县有的人还把人肝焙干后研成粉末“敬献伟大领袖毛主席”（参阅郑义的《红色纪念碑》）。

当年这些指使或亲自杀人的人绝大多数未受到法律的制裁，有的人甚至还升了官。例如主持过广西贵港大屠杀的王建助，就被提拔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大兴县辛庄公社杀过人的公社书记高福兴和团委书记胡德福不但健在，还在城里开着商店，而对严凤英开膛破肚的人至今也不认为自己有错，广西吃过人心肝的人几十年后谈起这事仍然面无愧色，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他们的行为正是党性坚强的表现。

不要以为这些手段只是用来对付“阶级敌人”的，中共对自己人也从来不手软。当年在江西苏区为了消灭所谓“AB团”，就杀死了四千多人，除了枪毙、砍头，还有多达十几种酷刑。什么打雷公桩、点天灯、香火烧、烙铁烙，对妇女则用香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房，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参阅陈歆耕著《红色悲剧》）。

到了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的审干和“抢救”阶段，使用的肉刑更是多达二十四种，因为康生说过“不用刑，那怎么审讯？”（参阅高华《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凡是经过延安整风的人，几十年后谈及当年旧事无不惨目伤怀，心有余悸。这些肉刑在中共建政后的历次运动中不仅被继续采用，到了二十一世纪还被王立军这样的酷吏大大地发挥和创新，例如在活人身体上摘取器官就是此公的一大发明。不但对待一般犯人如此，就是那些曾经当过中共高官的人也不能幸免。北京郊区有一座秦城监狱，原是中共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成用以关押高级犯人的地方。据吴法宪、邱会作这些曾被关押过的人回忆，这里面种种虐待犯人的手段也是花样繁多。如二十四小时用强光照射令人无法睡睡觉，不给卫生纸，犯人大便只能用手揩；关闭水龙头，只在马桶里留一点点水，犯人洗脸刷牙只好用马桶里的一点水。而且这里面的管理人员常常想出各种手段虐待和戏弄犯人，以此为乐。因为这正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党性坚强的表现。只有人性泯灭，兽性充分显露，中共才能把江山打下来，才能把江山“坐稳”。

二、党性就是奴性

一旦入党就要宣誓对党效忠，放弃个人的一切，包括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直至个人的生命。“把一切献给党”“做党的驯服工具”“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从此变成了毫无思想的动物，“会说话的工具”。这样的党员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驱使，而这一切最后又变成了对毛泽东一个人的效忠，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文革期间更是对对“最高指示”“传达不过夜，执行不走样”。普通党员要执行，党的高级干部也不例外。明明是正确的主张，只要忤逆了毛泽东的意志，无不遭到整肃、批斗、罢官撤职，甚至整死。邓子恢因为对农业合作化提出实事求是的意见就被打成“小脚女人”而挨整。彭德怀因为说出了大跃进中饿死人的真相，在庐山会议上被打倒，在文革中再度遭到残酷批斗，直至整死。王稼祥因为提出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对外援助

要量力而行而触怒了毛，被戴上一顶“三和一少”的帽子，文革中被批斗致死。所以中共实际上是一个暴君驱使一大批兽性的奴才与全人类为敌。毛死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无不以毛为榜样，只不过他们的手段比不上毛罢了。

三、党性就是痞性

为了一党之私利，置人类一切普世价值道德良知于不顾，不讲信义，不择手段。大革命时期，中共还是一个几百人的小党，为了借助国民党的力量壮大自己，于是奉共产国际的指令加入国民党。但是进入国民党后，立即施展分化瓦解，挑拨离间等手段，逐渐控制了国民党。“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国民党的家底中共一目了然，而中共对其党员发号施令，国民党却不知底细。”“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务，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引自王奇生著《党员、党权与党争》）中共在国民党内施展种种纵横捭阖手段自以为得计，却不料激成了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事件，使自己元气大伤。到了一九三七年，为了保存那跑了二万五千里后幸存下来的一两万人和国民党签订了《共赴国难宣言》，声称“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几年以后，它羽翼渐丰，就再不把自己说过的话当回事了。

痞性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抱团结伙，只问立场，不讲是非。自己人做的事坏的也要说成好的；别人做的事好的也要说成坏的。抗日战争时期，千百万国军官兵或献出了宝贵生命，或肢残体废，侥幸活下来的也是晚景凄凉。只因他们是“国民党的兵”，中共对他们的战功一概不承认，还要把他们打成“历史反革命”，有些地方连抗日阵亡将士的坟墓和纪念碑也砸掉。近几年，中共在联合国动不动就滥用否决权，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三次悍然否决对叙利亚阿萨德残暴政权的制裁案，可是却矢口不提它在安理会中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和否决权是怎么来的。那是国民政府领导全国军民浴血抗战八年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成为世界四强国之一才得来的。那个时候，中共在干些什么？它自己心里恐怕比谁都清楚。所以毛泽东要对日本田中首相说出感谢日本侵略的话就毫不足怪了。（近年来抗日战争的真正历史逐渐显现，但大多是民间所为，绝不是中共官方旨意。）

痞性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撒谎赖账，而且撒起谎来面不红心不跳。只要

看一看中共各大官媒（例如臭名远扬的《环球时报》）和各部门发言人的言论就知道了。撒谎已经成了他们的职业习惯，因为“不说谎话办不成大事”。特别是中共官修的《党史》更是“满纸荒唐言，只把真相昧。若非慧眼人，谁识其中味？”今天中国社会之所以道德沦丧，诚信崩溃，不正是因为中共做出了榜样吗？

毛泽东堪称古今中外最大的痞痞。就痞性而言，他可以说是中共全党之最。这个人以无法无天自诩，以施展“阳谋”为荣。抗日战争初期，他一口一个“蒋委员长”，还带头大呼“蒋委员长万岁”，可是等到他手里的军队扩大到一百万，还有二百万民兵做后盾时，他就要“质问蒋介石”了。在延安时他曾说“陈伯达党内最大的理论家”，到文革时就变成了“陈伯达和我共事二十多年从没有一句共同语言”。内战时期，他写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一九五九年就把彭打翻在地。若干年前，他说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到文革时就给刘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这两个人最后都被整死。林彪是他亲自挑选和培养的“最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最后却被他逼得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跟随过他的十几位秘书，大多没有好下场，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

毛泽东不但自己痞性十足，而且特别锤情于地痞流氓，在江西时就因为大量吸收这些人而遭到其他人的抨击，但他我行我素，认为这些人“打仗勇敢，革命意志坚定”，致使这一类人在中共党内逐渐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也是毛泽东用来左右全党的本钱，因为这些人绝对听命于他的。作家张正隆在他的小说《雪白血红》中，提到在东北“最早起来革命的农会干部中有些人并不是纯正的农民，而是流氓无产者。这种人敢想敢干。在这些人心目中‘共产共妻’是天下最好的口号和理想，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地主老财的钱财和小老婆共为已有，这等美事还能不甩开膀子大干特干吗？”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写的那个赵光腚，还有《铁道游击队》中的王强，《红日》中的石东根都是典型的痞子。最近几年在大陆热映的电视剧《亮剑》中的主角李云龙，虽然已被大大的美化，也仍然透露出十足的痞气。田纪云回忆一九四九年从冀鲁豫南下工作时，当时的政治部主任申某讲的一段话：“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就不是现在吃的窝窝头，喝的黄金油（玉米糊），晚上搂的剪发头，而是有大米吃，有鱼吃，可以找漂亮老婆。”可见这就是他们革命的动机和动力。所以一到南京，一些人就抢占好房子、好车子，玩舞女。还有一位高级干部，竟当面对当时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说：“一个人最

好讨两个老婆”（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这样一些人大量进入中共党内，致使痞性蔓延，痞性也就成了党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然，中共党内也不是没有正派人。早期参与建党的那些人，“一二·九”及抗战时期来到延安的大批知识青年，都是怀着真正的革命理想投奔中共的。因为这个时候中共以自由民主为号召，声称要实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因而吸引了大批青年人。但这些人后来不是被彻底“改造”，就是被整肃、开除。在经过了了几十年的腥风血雨以后，这一批人大都彻底觉醒，不断发出正义的呼喊。胡耀邦、赵紫阳是这批人中的杰出代表，顾准、李慎之、李普、李昌、黎澍、朱厚泽、胡绩伟、任仲夷、钦本立、谢韬、李锐、何方、戴煌、杜润生等是中共党内真正了解世界大势，真正能让中共脱胎换骨，起死回生的人，可惜人数太少，而且有生之年始终被压制。

要说中共党内最能显示出党性的人，第一个恐怕就数周恩来了。此人表面上温文尔雅，彬彬有礼，雍容大方，骗得了不少人，特别是知识界的好感。可是当年砍死顾顺章全家就是他直接领导下的特科红队干的。而且这个人典型的只知有党，不知有其他，为了一党私利，可以置国家民族的生存，安危于不顾。一九四一年，正当中国军民为了捍卫国家民族的独立和日本侵略者进行生死搏斗时，苏联却和日本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双方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此举使我国民众极度愤慨。救国会诸君子当即推王造时起草一封致斯大林的信表示抗议，这一爱国行动本应得到支持，可是周恩来却赶去“做工作”，劝说他们要“顾全大局”（什么大局？谁的大局？）不要将此信发出。一九四九年后中共掌了权，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又和王造时算了这一笔旧账，将他打成右派。

一九四一年发生的皖南事变，本是一个单纯的军纪问题，须知任何一个国家的最高军事当局都不会容许它的一支军队不听调遣，何况是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可是当时的八路军、新四军（正式名称应该叫作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穿着国军的军服，列入国军的战斗序列，领着国民政府发的军饷，却一贯自行其是，不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调遣，这是个什么问题？今天中共一再宣称，要将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它能容许一支军队不听中央军委的调遣吗？（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就因为不愿意

用自己这支军队去屠杀学生而被撤职关押。)这件事当时重庆各报包括很多民间报纸多作了公正评论,(参见舒宗侨、曹聚仁编著《中国抗战画史》三一九、三二〇页),而周恩来却出于中共一党的私利而大造舆论,说什么“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要说“同室操戈”的话,那么首先“操戈”的又是何人?一九四四年秋天,日寇趁我国很多精锐部队调往云南和缅甸作战,国内军力不足之机,发动了所谓“一号作战”,孤军突进,打到贵州独山。当时陪都重庆各报对这一事件都是低调报道,而周恩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却用从未有过的大字标题“独山沦陷”来报道。一周后独山被国军收复,陪都各报用大字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而《新华日报》却登在报纸的一角。周恩来早年曾就读南开中学,并得到张伯苓的资助,为此张校长曾对周严词训斥:“独山是中国的地方,独山丢了,中国人都应该感到难过,你们却用了那么大的标题。独立收复了,中国人都感到高兴,你们却在报纸的角落报道。这不是幸灾乐祸吗?”

抗战胜利以后,苏军在我国东北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不但把东北的大部工业设备拆运回国,还枪杀了我国政府派出接收的工程师张莘夫,此事激起全国人民的一致义愤,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重庆市各大中学校为此举行了抗议苏联暴行的大游行,以后其他城市也陆续响应,而周恩来却在此时跳出来“灭火”,说什么“爱国不是排外”等。当时国共两党正在谈判,可是为了军队和地盘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始终无法达成协议。到了这年年底,民盟方面出于尽快达成协议的好心,由梁漱溟起草了一个方案,只因这个方案事先没有和中共商量,而且并未偏袒中共一方,于是周恩来对梁严词训斥,说什么“我们是打出来的,我们可以去打游击,你们怎么办?”足见当时中共只想打,并无和平诚意。到了一九五三年,周恩来又重提此事,说梁漱溟在紧要关头是“维护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使人民失败的路线”。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周恩来在任何时候都是把中共一党的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如果说,当时的“国”是国民党的“国”,那么一九四九年以后,这个“国”就是中共的“国”,而他自己则是这个国家的政务院和国务院总理,他理当爱这个国了吧?其实不然。一九五六年,他作为国务院总理,试图对当时经济建设中的过热冒进行适当的抑制,这本是利国利民的正确措施,可是毛泽东却无端指责他“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他只好流泪检讨。一九五七年,马寅初提

出《新人口论》，建议实行计划生育，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必要，却受到康生，毛泽东的蛮横攻击。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向毛泽东说出了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周恩来对于这些情况其实也是心知肚明，可是他却站在毛泽东一边，对彭德怀落井下石。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由于搞了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闯了大祸，党内多数人都要求毛交出权力，退居二线，又是周恩来站出来说“主席还是主席”，从而继续维护了毛的最高统治地位。到了文革，他更是唯毛的马首是瞻，亦步亦趋。可以说，毛所做的坏事，没有周恩来的大力协助是办不成的。不仅对毛如此，对江青也低声下气。有一个跟随他多年的警卫成元功，江青说了声“成元功是坏人”，他就毫不犹豫地就把成交给江青处理。由此可见，对家，对民族有利的事，只要和中共的利益（其实是毛泽东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周恩来就会毫不犹豫地将中共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四、结语

请大家想一想，一个人身上如果同时有了“兽性”“奴性”“痞性”，将是何等可怕？然而中共正是要把正常人改造成这样的“人”，只有这样，它才能“打天下，坐天下”。一九四四年五月间，中外记者团曾到延安参观访问，大公报记者在访问归来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观感：“记者团在延安所见所闻，凡所设施，一切主张都是党在活动，党在主持……而在冀求做一个民主家的国民立场来看，总觉得其中有些问题。所谓增强党性，相对的就是减低个性，以致消灭个性，是党要支配一切，主持一切。民主是尊重人性的，坦率一句话，与其增强党性，何如增强人性。”（引自舒宗侨、曹聚仁编著《中国抗战画史》410页），可见对于中共的“党性”有识之士是早就看清了。

如果它还想继续生存下去的话，那就只有改邪归正，脱胎换骨，彻底抛弃它视命根子的“党性”，使自己转变成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政党。如果还希望唤起党员的“党性”来挽救自己的命运，那恐怕只能是痴心妄想，因它的大多数党员也都陆续觉醒，不愿再和这个党同归于尽了。❷

选自 尉天纵著《不同流集》，九歌书坊

【百年国史】

上山下乡运动中革命、代际关系和毛时代的媒体角色

孙沛东（美国）

《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1968-1981）》（以下简称《纪事录》），是上海书店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一部关于上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最新史料选编。在该书《序言》中，金光耀教授从人口统计学、“新生事物”、上海对本市知青流入地的物资和财政支援、《纪事录》的史料价值，以及超越知青史范畴的史料都做了梳理和分析，上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意义和价值毋庸置疑。原本无需我再狗尾续貂，轻妄论之，但是阅读带给我的兴奋和启发，促使提笔写下这篇书评。

首先，这一是部有抱负和野心的上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资料长编。所谓“抱负和野心”的意思：一是作者厕身上海，目及全国。这固然部分是因为上海知青上山下乡的足迹遍布东北、华北、华东、西南等地区，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32万多字的篇幅中，用少量的文字，编录了来自高层的权威资料，比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姚文元等人不同时期对知青运动的最高指示、指令等相关决策性和政策性文件，这些貌似与上海的上山下乡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实际上却是十分关键的信息，不铺陈这些，就无从理解在1960年代后期至1980年代初期，持续13年牵动了上海千千万万个人和家庭的知青运动的政策走向和脉络。没有这些内容，把握上海知青运动就缺少了主体线索。正是顺着这个思路，作者在不长的篇幅里，构筑了上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历史的三维实景图。在由少量篇幅勾勒的高层作为骨架，用中量的篇幅编录了来自上海各类报刊的资料，而以大量的篇幅描绘了上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整个过程。按照作者的构想，“这三个部分汇合起来，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整个脉络才真正饱满起来，立体起来，从而使每一条信息都能互为呼应，互为依傍，从而呈现出知青运动的整体相。”¹客观来说，两位作者比较好地实现了这个构想。

¹ 金大陆、林升宝编著：《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1968-1981）》，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376页。

其次，手头这本纪事录只是“初编本，”编者计划还要进行两轮修订，最终凝聚成百万字规模的资料集成。2014年初出版社组织了一众学者和各地上海知青的代表开会，讨论这本书。编者在会上表示已经开始修订工作。按照钱理群的说法，中国的精英高校，如北大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这种体制穹顶之下，大陆高校和科研院能超越者实在鲜见。学界普遍认为这种资料长编，纪事录这类资料辑录活儿，费时费力，无利可图：常年面对封尘的故纸堆，爬梳史料，身体苦且累；经年累月跑档案馆，面对日益拧紧的体制螺丝，各种限制和冷眼，谨小慎微地做着原本应该光明正大的研究工作，内心焦灼和煎熬；与古代史不同，当代史的资料浩如烟海，良莠芜杂，如何去伪存真，甄别考据并理出头绪是一个考验学术功力的差事，更何况当代史可能涉及的人和事，或者当事人仍旧健在，后人警惕，或者事件尚未盖棺定论，处理这些史料的过程中，下笔的轻重缓急，遣词造句时的斟酌，研究者着实不易。再者说来，在当下学术圈不少人分疆裂土，划定各自的学术领地，占据史料，申报课题，发表论文，出版专著背景下，金、林两位学者，一老一少，隔代相携，长达几年，坚持做着这样一件轻名薄利的事情，不止让我感念，更让我们看到中国知青研究的希望和力量所在。

最后，《纪事录》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研究开辟了诸多新的增长点。我主要从革命与亲情，知青与父母辈之间的代际关系，和上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媒体角色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过革命化的春节：革命与亲情

早在1968年11月，《文汇报》就反映出部分群众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不满。该报转载《红卫战报》文章，指出社会上部分人员对“上山下乡，当一个普通农民非常不满”，认为“上山下乡当阿乡”是“塌台”（页17）。1969年1月初，上海市革委会和市中等学校“红代会”在文化广场召开“欢送知识青年赴安徽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会”。全市首批去安徽农村插队落户的1万余名初、高中毕业生参加了大会。8日起，学生分批赴安徽农村。在动员少数不愿去农村的学生及其家长时，有些学校采用了强制办法。如将学生关在校内，强逼表态写决心书，不表态不放回家。个别甚至殴打、揪斗家长，强逼表态，强迁户口（页24）。

在插队落户一段时间以后，一些知青对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了抵触心理和行为。

1969年底市乡办向市革委会呈送的《赴安徽省学习慰问团工作情况报告》反映了一些存在的问题：一些青年到农村不是“革命一辈子”，而是“锻炼一阵子”，春耕在乡劳动3个月，随后返沪“避暑”2个月，秋收秋种再回乡劳动3个月，然后回沪过元旦、春节4个月。有的青年认为在农村是“无所作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没有必要”的。同时，一些社员和干部对上海知青能否在安徽长期插队落户存在疑问，认为今后的出路还是升学、做工、参军、当干部。20%—30%的生产队知青不够团结，主要表现在分居拆伙上，认为“分了好，各管各，矛盾少”。部分上海知青之间存在男女关系问题（页77-78）。

关于是否回沪过春节？官方态度很鲜明。1969年1月27日，《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落户在山西定襄县的25名北京知青关于“插队落户青年不回城过春节”的倡议。并同版刊登两封上海知青家长来信，“建议革命家长给插队落户的子女写革命家信”，让子女们在春节期间“安心在农村工作”（页30）。但事实上，尽管知青流入地对知青的春节探亲也对此假期和费用做出严格规定：1969年11月江西省铜鼓县规定：凡上海知青每一至两年回家探亲一次，探亲假期25天，所发生费用一律自备，不准报销（页76）。但根本不能阻止大批知青在春节期间返城。根据1969年11月17日市乡办向有关部门呈送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巩固工作情况》：当时全市共有返沪知青1.5万到1.6万人。多数知青表示要过完春节后返回，因为“路途远、旅费多”，“要在上海蹲出本钱来”（页75）。

针对这一情况，《解放日报》持续在知青回城过春节这一问题上明确表态，年初劝告返城知青立即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年底号召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1970年2月10日《解放日报》第3版刊登一组反映上海知青在当地过春节的来信和报道。文章同时配发编者按，希望从各地农村回上海过春节的知青，“立即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页86）。1970年12月29日《解放日报》第3版以《下乡知识青年要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春节》为题刊登数篇知青、家长来信，表示“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页111）。

不仅如此，在媒体的报导中，部分回沪知青被视为安全隐患。1971年2月25日《工人造反报》刊文提出“认真做好回沪知识青年的教育工作。根据上海南市区露香街道党委反映，回沪探亲知青所存在诸多不良现象：整天东游西荡和流氓阿飞混在一起，进行犯罪活动（页116）。1973年2月长宁区公检法破获流

氓打砸抢集团案。为首分子李某纠集在外地插队返沪知青10人，携带斧头、菜刀、铁棒、匕首等凶器，在北京路、西藏路、人民大道等闹市地区寻衅滋事。破案后，这些罪犯分别被判处5年至20年有期徒刑（页151）。

鉴于此，每年春节期间，市革会向本市各委、办，各局，各区、县革委会都会例行转发《国务院关于春节期间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宣传慰问活动的通知》，这种通知除了慰问，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节后动员回城探亲知青返回农村（页316）。1975年12月10日《文汇报》以《“今冬明春不回城，留在农村拼命干”》刊登文章，报道在吉林省安图县插队的上海知青今年春节不回城的消息。文章指出：上海知青最集中的亮兵公社，去年仅留下26人，今年已表示留下过冬的有75人，占在户总数的70%以上（页252）。到1976年，市政府有关部门仍旧试图做通回城过春节的上海知青的工作。《解放日报》以《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为栏题，刊登数篇上海各地做回沪探亲知青工作的报道，但是单单普陀区当年春节前期约1.45万名知青回沪，其中云南景洪东风农场1分场有300多名（页259-260）。

除了慰问和劝告知青坚守新岗位，放弃回沪过春节，上海对知青父母也做了相应的安抚和劝慰工作。1970年12月22日下午，市革委会有关部门举行座谈会，纪念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发表两周年。与会代表表示将“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光辉指示”。黑龙江省革委会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赴沪代表团出席座谈会。各区、县和基层单位，也开展了纪念活动。随后，上海市各区、县分别召开送子务农的家长代表会议，落实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会议期间，号召“送子务农最光荣，教子务农责任重，”开展“大批判”，进一步批判“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等言论。希望家长处理好“要我送”还是“我要送”、“公”字教子务农还是为“私”字教育子女、“教育子女加速思想革命化与抓好家长自身的思想革命化”等（页110）。这实际上是给出了知青父母中“革命家长”的标准和条件。到29日，《解放日报》更是倡导下乡知识青年要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春节，号召广大知青父母支持和劝告子女过革命化的春节（页111）。

此外，《文汇报》也以读者来信的方式表达了官方对知青恋爱问题的看法。1972年9月7日第3版刊登读者来信，希望知青不要过早谈恋爱，把精力集中

在“抓革命、促生产”上（页142）。革命与亲情，革命与爱情似乎是革命过程不容调和的矛盾。1979年1月23日上午，市革委会召开下乡知春节座谈会，与会领导表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好过去的遗留问题，仍旧号召知青“多干有利四化的事，多为国家分担困难”（页316）

这背后的逻辑是强调知青及其父母对国家的付出，分忧，要理解国家的困难，主动为国家分忧，要多干些有利于四化的事情。裴宜理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革命都是以反传统作为它的正当性来源之一。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很矛盾，利用它，也要推翻它。所有的革命者都要面临这种困境。在革命早期，他们不能完全割裂自己的文化，而且要利用传统文化，动员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参加革命，但同时革命目标之一就是要推翻传统的文化。因此，中国革命文化具有双重结构，表层的反传统的和反精英的政治文化与包括精英主义的政治治理方式的隐蔽结构。

2

二、知青代际关系：革命家长与家长革命

革命年代，革命一词的使用范围被无限地扩展，“革命家长”就是一个例子。革命家长的最初的提法来自《解放日报》。1968年10月31日第2版，《解放日报》以《革命家长要支持子女下乡上山》为题，首次称知青父母为“革命家长。”1968-1981年间，《解放日报》相关“革命家长”的报导有17篇，提倡“革命家长要做上山下乡促进派 积极支持子女坚持乡村闹革命，”“革命家长要支持子女下乡上山，”“革命家长坚决送子下乡，”“革命家长要过细地做在农村子女的工作，教育他们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用革命家信促进子女思想革命化，”坚持上山下乡正确方向的是“革命家长的好榜样”，是“革命家长的光荣责任”和“革命家长的光荣传统，”为了同心协力育新苗，“插队在孙吴县奋斗公社八队的上海知识青年在沪革命家长成立了串连会，”身为“送子女务农革命家长代表会议全体代表，积极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写信”等。³

主流媒体宣传和鼓动下的上山下乡运动，上海的知青父母做何感想？我试图围绕两个问题来阐释。第一是子女下乡带什么？第二是孩子怎么尽快回城？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该带什么？知青下乡，父母应该送红宝书，而不是大量的物质。1970年3月19日第2版《文汇报》刊登读者评论，指出子女到农村去应

² 唐小兵：《裴宜理谈安源革命的历史记忆》，《东方早报》2015年3月29日“上海书评”。

³ 引自本书初稿附录一“《解放日报》相关知青文章目录，”定稿时未收入。

该带的是“毛泽东思想”，父母该“给子女赠送毛主席的红宝书”，而不是大量物质。家长在为孩子插队落户准备行李上存在以下思想：多带点东西，可以少吃点苦；“千疼万爱就这一遭，孩子出远门，多买点东西，以尽父母之意”。以至“给子女买的東西越多越好，箱子装得越满越好，行李越重越好”（页93）。

到了同年7月28日市乡办向各区、县乡办下发《必须对下乡知识青年的行装准备加强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教育》。该文件表示：知识青年托运的行李有向大、重、多发展的趋势：今年6月下旬与去年3月运送的行李相比较，平均每人所占用的棚车吨位，从279公斤增加到445公斤。过去每出发1000人左右，用棚车5至6节，现在要用7至8节，而且托运的行李大而重，有的区托运的行李，五斗橱、被柜等要占20%以上。如新榆中学一次80人去淮北，大型行李48件，平凉中学一次14人去淮北，大型行李9件。这些行李装有大米、卷面、酱菜、食糖、咸肉、咸鱼、肥皂、草纸等，有的还携带猪油、豆油、酱油，个别甚至还带煤球和炉子。据有的区反映，去淮北插队知青，半数以上携带大米，有的可以吃到9、10月份，准备过了国庆农闲就回上海。在一些青年中把“购物清单”相互传抄。有些家长还为此与单位争补助、争借款，要求单位补助、借款200元以上的较多。沪东街道一位知青家长，要求单位补助200元，单位同意150元不行，提出“一手交钱，一手迁户口”。有些青年还为以前去插队知青拖带物品（页103）。

革命知青开始在主流媒体表态，不支持父母的这种重物质，轻思想的做法。《解放日报》1971年8月8日刊发知青孙金娣给父母的一封信，并加编者按，表示家长要从政治而非物质上关心自己的子女（页124）。孙金娣不是普通知青，1969年国庆节，党中央邀请314名知识青年代表来京参加国庆观礼。11个跨省、区安置的知青代表有69人，其中上海知青25人，孙金娣赫然在列（页71）。

《解放日报》刊登落户在山西定襄县的25名北京知青关于“插队落户青年不回城过春节”的倡议。并同版刊登两封上海知青家长来信，“建议革命家长给插队落户的子女写革命家信”，让子女们在春节期间“安心在农村工作”。（《解放日报》1969年1月27日第1版）

《解放日报》刊登群众来信，表示“革命家长应教育下乡上山的子女把艰苦朴素好传统带去，不要给他们做过多过好的物质准备”。文章并配发编者按，希望“革命家长决不能只管子女吃穿用，主要应当管子女思想红”。（《解放日报》

1969年3月4日第3版)

市乡办在革委会大礼堂召开“进一步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讲用大会”。本市1800余名知青家长代表参加会议。大会要求“革命家长，以实际行动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同版，刊登文章介绍两位家长“鼓励子女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农村艰苦奋斗一辈子”的体会，并加编者按称，“家长的一封信，往往会起很大的作用”。（《解放日报》1969年8月4日第3版）

针对那些“不革命”的父母，市革委会有关部门举行各类座谈会，号召“送子务农最光荣，教子务农责任重，”开展“大批判”，进一步批判“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等言论。希望家长处理好“要我送”还是“我要送”、“公”字教子务农还是为“私”字教育子女、“教育子女加速思想革命化与抓好家长自身的思想革命化”等（页110）。针对1970届中学生的毕业分配工作，媒体在继续提倡和赞扬“下乡光荣”，批判“下乡吃亏”论（页125）的同时，号召知青父母争做“送子女上山下乡的促进派”的同时，指出“深入开展大批判，促进上山下乡，”甚至上升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高度。1971年8月14日《文汇报》刊登读者来信，希望家长在1970届中学毕业生分配工作中，做“送子女上山下乡的促进派。”来信描述了一些家长在对送子女上山下乡的另外想法和言论：1.有的对子女说：“你的身体差，不适应农村的艰苦环境，最好近一点。”2.有些家长不支持、鼓励子女到农村、边疆去，还提出了一条理由：“难道去工矿就是不革命了吗？”3.有的家长私下对子女说：“你平常带头搞工作我支持，带头上山下乡要吃亏的，我不赞成。”4.有的家长还搬出了一套“家道尊严”来，说什么“你们要听家长的话”（页124）。《解放日报》1971年8月17日刊登徐汇区一知青办工作人员来信，介绍在1970届毕业生分配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时，配发短评《狠抓下乡上山工作中的阶级斗争》，认为“在下乡上山工作中，必须狠抓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表现为：有人公开威胁教师和红卫兵，说要“识相”点，否则要给颜色看。还有人冒充下乡上山工作组人员，写信给女同学，愿意“帮忙”，继之提出要求。有些家长，对负责分配工作的人员送东西，请吃饭，说好话……，希望照顾自己孩子分配在城市（页125）。

面对回城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拉关系走后门现象，知青父母也极为不满。根据1970年11月13日市乡办向有关部门提交的《长期学习慰问团向革命家长汇报

情况简报》，闸北区一家长向慰问团成员反映：“你看过我儿子的档案没有？你知不知道我儿子是中专毕业的？为什么招工不招我的儿子？我儿子有技术你知道不知道？”（页108）回城条件的区域性差异也是引起知青及其父母反弹的一个重要原因。1976年1月29日《情况反映》第12期反映了北京市放宽照顾回城条件，引起上海市跨省下乡知识青年产生思想波动，部分青年和知青家长到市、区乡办要求按照北京市的办法调回上海（页258）。

从1972年开始，部分知青父母开始单独上访，到1973年发展到各区联名上访，部分知青提出进京上访，甚至威胁对市乡办正常工作。1972年9月，知青家长上访人数不断增加，市乡办向市委、市革委会反映：最近上访人数增加，尤其独生子女和多子女家庭全部下乡的家长来办申诉情况集中，平均每天多达100多人次。主要反映子女下乡后家庭发生父母患病、父母双亡等困难。同时社会上传言外地独生子女已调回。个别家长认为“同一个市革委会同一条路线，相隔一年就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要求“还我唯一的一个孩子!!!”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批示建议报纸加强对中学毕业生“四个面向”的宣传，着重报导原来上山下乡中表现好的典型事例（页141）。1973年6月11日，市乡办向有关部门反映知青信访动向：一、各区出现联名上访信；二、有知青提出串连去北京上访；三、一些人员造谣生事，拦截、威胁乡办工作人员（页157）。6月19日，市劳动局革委会迅速做出反应，他们向国家计委呈送《关于半工半读、中专技校毕业生下乡上山工资待遇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表示：由于同工不同酬，致使部分学生和家長写信、上访省、市，直至国务院。市劳动局革委会对于他们的工资待遇，可按当地规定的由国家直接分配到农林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半工半读、中专技校毕业生待遇发给（页158）。

单个的上访仍旧继续，至今不断。1979年1月4日上午，王震、程子华等接见云南上访上海知青丁惠民等。同年3月，“新疆阿克苏垦区14团上海知识青年赴京上访团”出发赴京请愿。3月8日，与12、13团会和组成“阿克苏垦区（塔南）上海知识青年赴京上访团”。3月18日，上访兵团兵分两路，一部继续北上，一部回上海。5月12日，请愿团离京返疆（页320）。同年3月22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0余名上海知青组成赴京请愿团，希望有关领导予以解决知青返城问题。此后，上海在疆知青先后在7月，9月和12月三次上访（页321）。

三、上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媒体角色

互联网时代，学界，尤其是新闻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界对新媒体（尤其是微博，微信，Facebook 和 Twitter 等社会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⁴事实上，旧媒体时代，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专指 1949-1976 年）的中国，媒体，尤其是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同时刊出的社论）和《新华社》等党媒对中共中央高层意旨的指引和贯彻的作用，缺乏更深入的研究。就上山下乡运动而言，对媒体的作用的剖析，尤其是高层政治，基层动向与媒体的三者互动依然鲜见理性和历史的剖析。

在毛泽东时代，电视比广播更为新颖，而且有画面信息，对受众的吸引力更大。1959 年国庆上海人民电视台正式开播，最初，电视台年度盛大的转播活动是每年的五一和十一庆祝集会，游行和游园活动。⁵到 1960 年代末，电视台也配合党和国家，尤其是上海本地社会有关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同阶段的推进，进行了动员和整合的努力。在动员阶段：1969 年 3 月 11 日晚，市革委会下乡上山办公室、市中学红代会、上海电视台革委会联合举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知识青年赴内蒙古插队落户电视报告会”（页 37）。直到 1973 年 4 月 17 日，因大量上海知青到黑龙江，黑龙江省电视台才开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专题节目。⁶这比上海的同类节目晚了整整四年。早在 1968 年 6 月 18 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和工农相结合的大道上前进”栏目开播。该栏目将广播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同学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必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伟大教导，正确对待毕业分配的体会；交流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经验；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在毕业生分配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邀请了前几年在农村落户的知识青年，谈他们锻炼成长的体会。值得注意的是，原先使用同一频率开始的“新闻和本市报纸摘要”节目，从即日起改为推后半小时开始（页 6）。

在知青教育和培训阶段，从 1974 年 12 月到 1976 年 2 月这段时间，上海电视台连续为回沪探亲知青及其他青年试办电视教育讲座。1974 年 12 月 20 日，上海电视台为回沪探亲知青及其他青年试办电视教育讲座。讲座自 12 月 23 日到

⁴ Guobin Yang. 2009.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⁵ Peidong Sun and Aminda Smith. 2019. "Constructing 'New Shanghai': Political rhetoric in spac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hanghai Race Club (1949-1965)."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26: 55-79.

⁶ 黑龙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黑龙江省志·广播电视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85 页。

来年2月底，分为政文、农村机电、医疗卫生3个科目，每科10讲，共30讲。每讲2小时。播出时间是每星期1、3、5下午2点至4点（页222）。1975年7月1日，上海电视台继续为居民和城乡知青试办电视教育讲座。讲座暂设政治、工农业知识、医疗卫生等课程，主要采用专题形式进行讲授。讲座的播送时间是每周星期1、2、3、5的下午3点至5点；星期1晚上6点30分至8点30分是专对郊区农场和农村播送时间。（页242）。1975年12月18日起至1976年2月底，上海电视台每星期四下午为回沪探亲知青举办专题讲座。讲座分为《农业学大寨》《水浒评论》《文艺评论》和《写作知识》四类十讲。每讲2小时（页252）。

其他小的方面的研究线索不胜其数。文革中，江青对文化战线的破坏有目共睹。《纪事录》中谈到南京五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任毅的故事，1968年12月到江苏省江浦县插队，后创作《南京知青之歌》，广为流传。因上海知青参与传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向中央汇报。张春桥批示：“上海市革委会有专门小组在抓这件事”。江青、姚文元批示：“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1970年2月12日上海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根据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的批示，派人到南京五中，了解《我的家乡——南京知青之歌》及创作者任毅的情况，并要求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提供材料。2月13日，根据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的批示，上海、南京两地公检法军管会人员到江苏江浦县永宁公社调查知青任毅的情况，并直接与任毅谈话。2月29日，根据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批示，《南京知青之歌》作者任毅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罪名被捕。

但是，江青对文化界只有作恶吗？丁东先生专门著文叙述江青对陈景润的帮助，1973年底，秘书杨银禄进入江青的办公室，看到她拿着一块小毛巾正在抹眼泪。她用哭腔对他难过地说：“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内最深奥的理论，不少发达国家的高级数学专家都在研究运算，陈景润在这方面作出贡献，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他的境况竟是这样，我们能不管吗？”过了几天，江青将有毛主席和她本人的批示的《清样》拿给他，发现上边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主席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又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江青认为：“姚文元‘书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对题。你给迟群打个电话，告诉他赶快到我这里来，这是他负责的领域。”在江青的直

接关心下，陈景润的生活，科研和政治待遇都大大提高。⁷江青登上高位后作恶甚多，但她对陈景润的帮助还是应当实话实说的。

《纪事录》中谈到一九七四年八月七日，云南省安办《情况反映》第十七期报道一上海知青翻译了《林肯传》，并写了7000字的前言。译稿寄中央办公厅。此后，根据江青、姚文元阅后的指示，国家出版局派人到云南对译者本人和家庭情况以及译书的经过做全面了解（页211）。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另外，根据翁志军提供的资料，李庆霖转呈一回乡知青写给江青的信，反映当地存在包办、买卖婚姻现象。江青作出批示：请洪文同志参阅。后王洪文批示：请永志高同志查处（页223）。或许后续研究可以深入追踪：这两件事情最终结局如何？她有没有进一步的批示？这些批示与事情的结局有何关联？江青在其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郭于华认为“成王败寇”是共产主义文明的逻辑中的重要内容，尽管“四人帮”集团覆灭以后，正统党史对江青在文革中，在陈景润最困难的时候给予的帮助讳言不语，但完整而真实的历史不应该不顾客观事实地贬低一个“恶人”（如江青），也不能有意拔高一个“圣人”（如林昭）。

比如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八日《文汇报》第2版以《争做大学生当农民的带头人》为题，刊文报道复旦大学外语系1974届毕业生曹恒彩重回海丰农场的事迹（页247）。一九七四年二月八日《文汇报》刊登题为《以实际行动批林批孔，同旧传统决裂》的报导，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学员于安娜在上海市文教系统批林批孔大会上发言，于安娜提出退学申请，要求下乡。于安娜通过“走后门”成为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学员，其父亲是革命干部。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黑龙江克东县委召开大会，欢送一上海知青从县直机关重返农村。类似案例很多，后续研究如果做一个个人生命历程研究，尤其是做一个对照组研究，关注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走过来的“毛的孩子们”在市场经济时代是否仍旧青春无悔是很有价值的，

在我看来，这部书就像一棵在春风中摇曳生辉的绿树，透过不同的枝桠，可以看到了许多新的可供研究的问题，尤其是诸多新研究的线索。总之，《纪事录》为上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研究提供了一枚指南针。如果全国当年的几个主要知青流出地如北京、天津和广州等地都能出版类似资料汇编，可以想见这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知青群体，对共和国的生命历程，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的贡献

⁷ 丁东：《江青曾帮助陈景润》，《文史参考》，2010年第21期。

和价值，这一点毫无疑问。

最后，史料价值。面对一部史料辑录，似乎不探讨其史料价值，有唐突美人之嫌。不同时期知青分配原则和标准问题。过去学界普遍认为知青分配中，接收单位更注重其家庭出身之类的政治指标，没有充分认识到“掐尖”现象的存在。

《纪事录》中有一个史料谈到《解放日报》1968年10月23日第2版刊登题为《下乡插队落户的学生应该统一分配》群众来信，讲述奉贤县一些公社、大队在接收知青时，指名要“跳舞、唱歌、画画、装收音机、搞广播的所谓‘业余技术尖子’”。这导致同学不满，产生私自“挂钩”现象（页14）。

家庭出身和个人表现与分配地的问题，不分配“问题青年”到边疆县。1969年12月1日，海、北京、天津、浙江、黑龙江等五省市下乡上山办公室负责人在上海就1970年的知青动员和安置问题进行协商，中央安置办人员列会参加。会议就下乡知青的条件、安置的对象、下乡后病号处理以及冬装补助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会议最后决定：安置知青主要是1966届以后的各届高、初中毕业生，其中除病残外，政治条件好和坏要搭配去。对于个别出身不好，本人又一贯表现不好，或流氓成性的，不安排去边疆县，可适当分插到黑龙江内地（页77）。

附录中的统计表格的价值。附表27个，附录2个。初步理出了一些后续研究的线索。附录包括“文革时期上海知青题材出版物一览表”和“上海知青在黑龙江亡故者名录”。知青题材出版物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对象，不单单历史学感兴趣，对知识社会学，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都有吸引力。知青亡故者名录是一个很沉痛的选题，像汶川地震儿童死亡名单一样，对非正常死亡的研究的价值不言自明。这些上海知青为何而死？疾病，意外，自杀，他杀等等死亡类型有哪些？患病而死，哪些疾病？与其当时的工作和生活有无关联？是否有地域性因素？因公牺牲都有哪些类型？哪些因素导致因公牺牲？非正常死亡与年龄，性别，出身家庭，在上海的居住区域和受教育程度有何关联？这些问题都像一个个谜团，有待解开。该书最后，还附有两个地图：分别是“文革时期全国安置上海知青分布状况示意图”和“文革时期江西安置上海知青分布状况示意图。”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除了学术用途，对于全国一些地方性知青纪念馆的布展有实用价值。纪念馆可以采用新技术，使这一研究成果得到可视性很强，又富有动感的呈现。

研究风雨仓皇，曲折苦难的国族历史，比如文革史和知青史，是一个深不见

底的黑洞。阴暗、幽冷、诡异、残忍和荒诞无处不在。研究者便是要拿出“拆下肋骨当火把”的勇气，穿越这浓雾弥漫的迷宫。难得的是，已过耳顺之年的金老师研究激情不减。80后的小林也是，话不多，总是带着浅浅的笑，时常泡在档案馆。2013年上半前，我们每周都有一、两天在档案馆，每天中午与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其他几位同行，约莫6至7人一起去档案馆附近的小餐馆吃饭，快乐和富足。清早奔馆路上，我们以“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自诩，闭馆回去的路上，我们心中回想起“打靶归来”这首歌，浦江之风缓缓地吹。

然而，此去经年，这一切单纯的研究和授课之乐，一去不复返。2020年，大陆知识人再次被抛向历史的大江大河。去年2月全球新冠疫情席卷之时，我辞去国内教职，挈女将书，去国离乡，先后在母校巴黎政治学院和海德堡大学做访问教授，不期盘桓欧洲已将近两年。在2021年初冬奔赴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职之际，内心百转千回。在这动荡不安的人世间，以此短文，纪念诸多大陆师友与我的学术情谊。☞

【补白】

邓小平的笑

邓小平他们是聪明人，先保住脑袋再说。要是邓小平抗拒文革，拒写“永不翻案”的检讨，他也许会像刘少奇一样，可我学不来。我和大家看电视，十分注意邓小平，观看他是真服罪还是假服罪。有一次，我看见他低头在毛主席身边儿走过，忍不住一笑，使我感到他是笑，他把毛主席哄了。看见他的笑，我立刻想起30多年前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师范一个学生的笑。

那是在抢救运动中，有一个学生坚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眼看就要挨打、挨吊了。他偏过头去，偷偷一笑，转过脸来，立刻承认自己是特务。邓小平的笑和那个学生的笑是那样相像，历史不会重演，却是那样相似。☞

摘自刘衡《直立行走的水》自印书，第192页

【百年国史】

绘本特殊年代 (1959--1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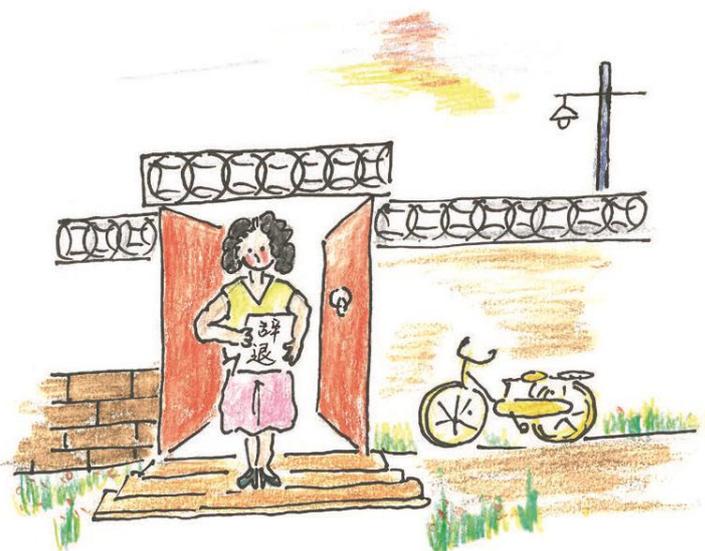
——漫笔童年饥饿 (二)

墨娃

特殊年代 · 墨娃绘本 · 上册



我二哥一年级的時候，每天下午三點半到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听小喇叭。常常饿的听不下去，总问我妈几点吃饭，我妈说六点半，为的是晚点吃，早点上床睡，一夜很快过去。



老百姓莫名地天天挨饿，
庙堂还要高喊大跃进，反
右，阶级斗争，尽是胡扯。我妈
在单位开会时说了点什么，麻烦来了，说她“右倾”，没多久，
我妈就被单位轰回家，丢了工作，那些日子，我们睡不着觉，
得了“神经官能症”，至今，我都不明白这是什么病？



老百姓莫名地天天挨饿，庙堂还要高喊大跃进，反右倾，阶级斗争，尽是胡扯。我妈在单位开会时说了点什么，麻烦来了，说她“右倾”，没多久，我妈就被单位轰回家，丢了工作，那些日子，我们睡不着觉，得了“神经官能症”，至今，我都不明白这是什么病？



1961年的春天，我们家从北京府右街搬到复兴门外中央广播电台的新302大院，全民饥饿越来越严重，右邻右舍人人浮肿。我爸我妈聊天说，东城还是西城有特供商店，十三级以上干部可以凭证件买到市场稀缺的食品。我们家级别不够不能买。有一次，我夜里被饿醒，我妈拿了一块窝头片，让我几口就吃了。我妈掰窝头的时候，闻见了一股馊味……

1961年的春天，我们家从北京 府右街搬到复兴门外中央广播电台的新 302 大院，全民饥饿越来越严重，右邻右舍人人浮肿。我爸我妈聊天说，东华门有特供商店，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可以凭证件买到市场稀缺的食品，我们家级别不够不能买。有一次，我夜里被饿醒，我妈拿了一块窝头片，让我几口就吃了。我妈掰窝头的时候，闻见了一股馊味。



商店里几乎没有小孩的零食，如果有，也凭票，来晚了就没了，眼看我成了豆芽菜，每天啼哭。有人悄悄告诉我妈，东直门外有一户农民，他养了几只羊，他卖羊奶，一个月三块，半磅奶，他天天给送，但是不能让外人知道，如果让村里人知道，就得挨批评，说是薅社会主义的羊毛。于是我就有奶吃了。大叔每天夜里骑车，把羊奶悄悄放在我们家门口……

商店里几乎没有小孩的零食，如果有，也凭票，来晚了就没了，眼看我成了豆芽菜，每天啼哭。有人悄悄告诉我妈，东直门外有一户农民，他养了几只羊，他卖羊奶，一个月三块，半磅奶，他天天给送，但是不能让外人知道，如果让村里人知道，就得挨批评，说是薅社会主义的羊毛。于是我就有奶吃了。大叔每天夜里骑车，把羊奶悄悄放在我们家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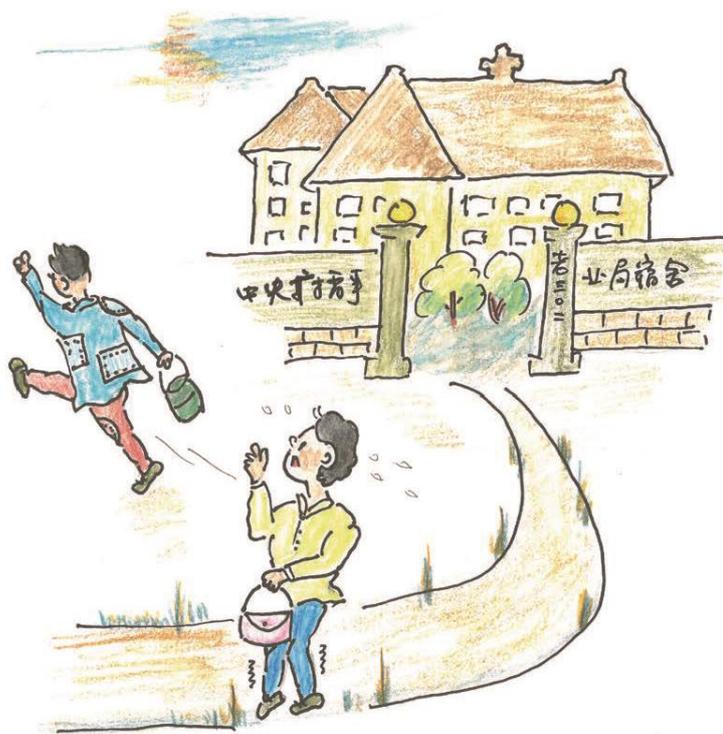


邻居老作家寒风是上校，每月可以从部队得到一些补给。有一次，寒大爷悄悄地给我送了一碗黄豆，说我太缺营养，让我妈给我煮水喝。那年月，一碗黄豆真的可以救一条人命……



有一天，我妈带我去买粮食，队很长，好不容易排到窗口，却少了五斤粮票，我妈放声大哭，很多人劝不了，哭了一个多小时，后来还是在收银员的算盘下找到了，我妈一边哭一边说：这是我们一家人好几天的口粮……

有一天，我妈带我去买粮食，队很长，好不容易排到窗口，却少了五斤粮票，我妈放声大哭，很多人劝不了，哭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在收银员的算盘下找到了，我妈一边哭一边说：这是我们一家人好几天的口粮……



· 所有的人都在挨饿，那时候到处
发生抢劫食品的事件。我发小的哥哥的妈妈
有一天早上去上班，刚刚出宿舍的大院，就被一
个人把带的中午饭抢走了。饥饿真可以限制人们的想象力……

所有的人都在挨饿，那时候到处发生抢劫食品的事件，我发小的哥哥的妈妈有一天早上去上班，刚刚出宿舍的大院，就被一个人把她带的中午饭抢走了，饥饿真可以限制人们的想象力……



中央广播事业局的专家楼在新 302 的东边，我记得里面住着苏联、波兰、捷克、东德、越南、朝鲜、古巴、阿尔马尼亚等国的专家，时逢六十年代的三年饥饿，专家楼的垃圾箱每天总有一堆宿舍里的孩子在那里扒垃圾，捡吃的东西，我站在家门口远远地望着，记在心里。



1961年初夏，我的祖母病故了，一百来号人出殡，吃饭是大难题。每家自带粮票，每人一碗稀稀的打卤面。一家人打着幡游街浩浩荡荡，我是家人最小的，由我二姑父领着跟在队伍的后面，一会儿就饥肠辘辘了。

1961年初夏，我的祖母病故了，一百来号人出殡，吃饭是大难题。每人自带粮票，每人一碗稀稀的打卤面，送殡的队伍浩浩荡荡，一家人打着幡，我是家里最小的，由我二姑父领着，走在队伍的后面。一会儿，大家就饥肠辘辘了……



粮食配给的家都不够吃蔬菜几乎
 没有，却是白菜叶子、帮子、咸菜度日，由于中央
 国家机关号召各单位养殖“小球藻”，说白了就
 是青苔，用水泥砌个池子，放些细菌，没几天就
 一池子，没有营养。我爸从食堂买回的窝头都是绿色的……

国家配给的粮食根本不够吃，蔬菜几乎没有，平时就是白菜叶子，白菜帮子，咸菜度日。由于中央国家机关号召各个单位养殖“小球藻”，其实就是水里的绿苔。大食堂用水泥砌个池子，放些细菌，没几天满池子绿苔，说有营养。我爸从食堂买回家的窝头都是绿的……

【评论】

“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 (72)

——关不进监狱的母亲河的愤怒

李南央（美）

今年长江汛期高峰尚未到来，三峡大坝上面的重庆，下面的宜昌，已经被淹得七荤八素。本来可以用堤防和分洪区化解的长江流域的洪水威胁，被中共政权引以为傲的，占据了数个“世界之最”的三峡工程生生地变为洪水猛兽。

《李锐口述往事》一书中有一章“我和水电”，内中在“三峡工程”篇中有一节“我为什么反对三峡到底”，引述内容如下：

三峡是我这辈子反对到底的一件事情。我跟我的外孙女忙忙说过：“将来三峡出了事儿，你要记住，你的外公是坚决反对这个工程的。”我为什么不赞成上三峡，已经讲了很多了，我再把它总结一下，三峡问题当年考虑，现在考虑，反对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防洪。从防洪角度讲，不能够依靠一个水库来防洪。……三峡大坝在宜昌的门口上，只能控制住整个流域面积的一半，即只能控制住西水，对下游完全不起作用。而长江发洪水的规律是：最早是北面（支流），其次是西面（支流），最晚是南面（支流），北水，西水，南水，洪水的汛期是错开的，所以洪水发生率没有黄河那样频繁。那么为什么会有大洪水呢？是由于汛期的变化造成的，汛期早的推迟了，汛期迟的提前了，南、北、西水碰了头，就发生了洪水。三峡对四川以下这三面来水是管不到的，而下游发洪水最大的危害是内涝，就是支流的水位抬高了以后，不能及时排到干流里面去，对湖北、湖南、江西、安徽造成涝灾。所以三峡水库控制长江洪水的说法，根本就是夸大其词。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三峡对湖北来说，可以减轻荆江大堤北岸湖北的洪水威胁，但这又出现了新问题，三峡流出来的清水会对荆江大堤造成过去浑水所没有的冲刷力，荆江大堤会因此变成危堤。因此，长江全流域的防洪还是应该按照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的决议：堤防、利用湖泊洼地蓄洪、分洪并进的方式解决。

第二、发电。钱正英他们也知道三峡主要用来防洪是站不住脚的，为了让三

峡上马，逐渐将它演变成发电为主的工程。从发电角度看，更简单了，一句话：三峡不是个好电站。因为三峡水库毕竟控制着长江流量的一半，上游汛期到来以前，水库的水位需要降低，留出防洪库容，但是万一哪年遇上枯水，先把水放掉了，可来水又不多，落差减低了，发电势必受影响，对电网的供电造成极大的不平衡。

父亲李锐还提到了第三、航运，第四、投资，第五、移民，第六、地质问题，第七、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问题、古文物问题、库区、特别是重庆市的垃圾问题……等等。这里不赘。

今年的宜昌大水，除了暴雨因素，与三峡水库悄悄放水绝对有关。中国的天气预报水平已十分先进，六月长江上、中流域的暴雨是有预警的。为什么三峡水库不提前放水？非要等上游洪水凶猛而至时才降低库内水位？答案就在上引李锐“口述”的“第二、发电”之中。三峡的发电由中国长江三峡集团主导，这一“主要从事发电业、电力工程建设的特大型中央企业”（维基百科之语）直通李鹏家族及其卵翼团体的“钱袋子”，它是决不会因为老百姓要活命而放慢三峡发电这部印钞机器的运转速度的。

父亲李锐在“三峡工程”篇中还有一节“三峡的问题说到底是体制问题”：

世界上有两个大坝会议，其中一个排列了全世界十个最危险的大坝，三峡是第一名。我们中国的领导人真的就不懂三峡的问题有多严重吗？我看，不能说中央的领导人都不懂，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都知道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毛泽东那样自认为无法无天的人，至死都没有再提三峡。为什么现在能通过，能开工？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国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看法是：从根本上来讲，是国家制度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还是人治，就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体制。因为邓小平赞成，王震这样的人帮腔，所以三峡一定要上马，其他人说什么都没有用，绝对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特别是重大问题，听不得不同意见。现在就是围着江泽民转嘛。黄万里这样的专家的意见谁也不听，他就来找我，我的意见，也是谁也不听，你有什么办法。黄万里是去年（2001年）去世的，我记得九月八日遗体告别我去，是从水电学会的会场上直接去的。那天开会我旁边坐的是谁呢？张光斗、潘家铮。张光斗，黄万里清华的同事，潘家铮，三峡工程的头头，这两个人根本没去。告别完了之后，我又回到会场继续开会。感慨无穷！我们这

种体制、这种制度！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们国家的总体决策方式也好，建设路线也好，三峡工程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黄万里的命运是一个最具体的例子。鲜明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正确的意见被否定，错误的意见吃香；对人才的使用是淘汰好的，启用坏的。

2013年10月29日，北京海关扣留了《李锐口述往事》这本书。我于当年的12月25日委托律师对北京海关违法扣书向北京第三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至今法庭发出十九次延审通知，不予开庭。李锐在这本书中陈述的“三峡工程”之争的史实，被死死地堵在大陆的海关之外，绝对不让里面的人听到。

毛泽东、邓小平领导的共产党是个“思想要守纪律”的政党，到了习近平这一代，“纪律”“进化”成了“规矩”。无论你身处党外还是党内，不守“老大”定的“规矩”，监狱伺候。但是被拦腰截断的长江，共产党用镣铐锁不住她的愤怒，“一张报纸”造就的岁月静好的天堂，当母亲河的洪水滔天而降时，转瞬间便是狰狞的地狱。到了那个时候，一切的一切都晚了……

2020年6月30日

写在中国共产党进百高龄之前夜

【序跋】

百年歌声：简析词曲中的近现代中国 · 序言

1864年——1979年

马昌海

20世纪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与社会经济的历史性变革直接相关。在这100年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由君主专制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转接，被称之为“百年转型”。从音乐文化的历史脉络来看，20世纪以前，数千年间传承下来的民间歌曲、戏曲、说唱、歌舞、社火、器乐、文人琴乐（如云南丽江纳西古乐）、词调酬唱，庙堂之音及宗教祭祀音乐（如无锡“瞎子阿炳”华彦钧的道教音乐）遍布于传统社会的角落，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精神伴物。自20世纪之初始，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古今新旧文化、中西文化、雅俗文化的冲撞、变革、交流、吸收、融合这一历史背景下，

中国音乐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其结果是教育、创作、表演、学术研究的高度专业化、“学院化”，史家将这种深受西方专业音乐思维模式影响而产生的音乐称之为“新音乐”。“新音乐”的历史虽然只有100年，却改变了20世纪中国音乐的总格局，由之前传统音乐的“一统天下”变为“五分天下”（新音乐、西方音乐、传统音乐、流行音乐、现代音乐），这一格局伴随了20世纪中国社会向现代化演进的全部进程。

什么是“红歌”？我所选用的历史歌曲和后人创作的历史题材的作品，恐怕不能一概通称为所谓“红歌”，红者，革命也。歌颂党和领袖，歌颂人民军队，歌颂社会主义及其建设事业，歌颂劳动人民，歌颂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成就，现在都被人列入了“红歌”的范畴。那政治意义比较模糊，不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概念宽泛的爱国、爱乡（各地的壮丽秀美风光），歌颂高尚道德风范、优良品质的歌曲，算“红歌”吗？

“红歌”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缺少科学的内涵和外延。宣传环保的“绿歌”，算不算“红歌”？“红歌”的概念也不太好发展，无法界定，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有学者认为“红歌”特指1942年5月以后，以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为指导思想而创作的“红色经典”，才算真正意义上的“红歌”。那在这之前创作的鼓吹民主革命、宣传妇女解放；呼唤民族觉醒、富国强兵、团结御侮、振兴中华；倡言破除迷信、开通民智、提倡科学、兴办实业，提倡勤奋学习和体育锻炼、反映学生生活的学堂乐歌，辛亥革命歌曲，五四爱国歌曲，北伐大革命时期的歌曲，中国工农红军歌曲，1942年5月以前创作流行的大量的抗日救亡歌曲，算不算“红歌”？如果革命战争年代和宣传抗日救亡的情歌可以算“红歌”，那其他时期产生的情歌算不算“红歌”？再比如我收录的《北洋海军军歌》、孙中山作词的《中华民国颂》，后来的《黄埔军校校歌》、刘雪庵作曲的《中华民国空军军歌》显然不能算是红歌。

歌曲是历史的回声，反映了历史的面貌。我试图按照不同的历史阶段，从一些有代表性的歌曲中（包括其历史背景，歌曲内容，作者简介，创作故事，歌曲产生的影响，历史地位及意义等）观察和分析中国近现代的发展与变迁。

第一章 “学堂乐歌”

“学堂乐歌”是近代中国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而兴起的歌唱文化，指学校开设的音乐课和为之而编创的歌曲。一批启蒙音乐教育家纷纷创作新歌，编印各种歌集。各种撰译、编印介绍西洋音乐和新歌曲的书谱刊物陆续刊发，促进了新音乐的发展，使得学堂唱歌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一种新的风尚。“学堂乐歌”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和音乐文化历史的开端。

当时的乐歌题材非常广泛，如鼓吹民主革命、宣传妇女解放；呼唤民族觉醒、富国强兵、团结御侮、振兴中华；倡言破除迷信、开通民智、提倡科学、兴办实业；勉励敬业乐群、敦品励学、惜时爱物的，提倡体育锻炼、反映学生生活的。其内容多富于教育意义，对培养学生的精神和品德起着积极作用。

第二章 辛亥革命与五四建党大革命时期歌曲

一、辛亥革命时期的歌曲，大多仍然是“学堂乐歌”

重点介绍欢呼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新政的代表作。

二、五四时期歌曲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由于我国专业音乐创作队伍尚未建立起来，这一时期歌曲创作仍然基本延续了学堂乐歌填词的创作办法，出现了一些反映当时革命斗争的歌曲，在工农革命运动中发挥了作用。

四、描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农运动高潮的歌曲

五、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的歌曲

第三章 20世纪二十年代新音乐歌曲

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音乐文化进入了名副其实的专业音乐创作时代。它超越了学堂乐歌“旧曲填词”的编创方式，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萧友梅和赵元任等人的音乐创作，改变了歌曲创作以填词为主的状况，开创了歌曲创作的新时代，把我国现代音乐文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继承了“学堂乐歌”传统，并在运用西洋作曲技法来创作具有中国风格音乐作品方面取得了初步的进展，其内容也反映了“五四”的时代精神。

1. 留学日本和欧美的“中国现代音乐之父”、作曲家、音乐理论家、中国现

代音乐教育奠基人肖友梅创作的作品。其创办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的业绩。

2. 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的音乐成就。

3.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向现代音乐美学转型的开拓者，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先驱者青主创作的艺术歌曲。

第四章 中国工农红军及根据地歌曲（后人创作的歌曲为主）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

介绍吕远作曲的组歌《井冈山的道路》

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三、“工农武装割据”：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阐发

四、红色政权的建立

五、动员群众参加红军

介绍瞿希贤的《红军根据地大合唱》

六、红军和群众情谊深厚

七、红色根据地少年歌曲

八、陕北红军根据地歌曲

九、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朵奇葩——红色娘子军

第五章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歌曲（基本上为后人创作）

一、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何以败走中央苏区？

二、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

三、四渡赤水与过彝族区

四、飞越大渡河与过雪山草地

五、长征的胜利及其历史意义

第六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城市新音乐歌曲

一、对中国1930年代专业音乐领域贡献最大的音乐家黄自

二、留美学院派——意大利美声唱法女音乐家周淑安

三、美声唱法音乐家应尚能

四、学院派作曲家李惟宁

五、作曲家、琵琶演奏家谭小麟

六、赵元任在三四十年代的歌曲创作

七、黄自的四大弟子：贺绿汀、刘雪庵、江定仙、陈田鹤

八、1940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的歌曲创作

反映社会现实的时调小曲；国统区讽刺歌曲；反映爱国民主斗争的群众歌曲；向往解放区和新中国的歌曲；国统区的大型合唱作品；器乐与歌剧的创作。

第七章 20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歌曲

一、任光的电影音乐创作

《渔光曲》开创了电影歌曲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时代风尚。

介绍著名剧作家、歌词作家安娥。

二、聂耳的歌曲创作

介绍“现代关汉卿”田汉，他不仅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以及戏曲改革事业的先驱者，也是中国早期进步音乐、电影事业的卓越组织者和创造者。

三、冼星海的歌曲创作

冼星海的音乐理念：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直至赴延安的音乐家中，冼星海是最少带有偏激情绪和宗派色彩的音乐理论家。

第八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音乐（上）

流行音乐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属于城市大众文化范畴，与学院派严肃音乐和民间音乐、传统戏曲等共存于世。

中国流行歌曲在1920-1940年代有过两个发展阶段。

1927-1936年，以黎锦晖为代表的前期阶段：黎锦晖是中国歌舞音乐的开拓者和流行歌曲（“时代曲”）的奠基人。从歌曲创作风格、歌星群体的产生、演出机制等各方面开辟了一个流行音乐的时代，形成了前期探索阶段的面貌特征。

黎锦晖的流行歌曲以民间小调为基本元素，曲调流畅动听，富于民族特性美感；有的适用于歌舞厅演奏，乐队伴奏吸收了爵士乐的特色。两者结合协调。

第九章 “歌王”黎锦光和“歌仙”陈歌辛的歌曲创作

1937-1949年，以黎锦光、陈歌辛为代表的流行音乐后期阶段

继黎锦晖以后，写流行歌曲的有黎锦光、陈歌辛、徐如辉、姚敏、李厚襄、严个凡、严华、严折西、梁乐音、陈瑞帧、刘如曾等十几人。其中作品最多的陈歌辛主要写电影歌曲，黎锦光则为“百代唱片公司”写作。这一阶段的流行音乐突破了前期创作风格的单一格局，题材更为丰富多彩，具有了多种媒介（电影、电台、歌舞厅、酒吧）所需要的视听效果。这就逐渐超越了黎锦晖以组织歌舞团演出为主要传播媒介的局限性。当时的上海舞厅林立，爵士乐队众多，上述作曲家才华横溢，在创作风格上有很多突破；一批歌星如周旋、白虹、姚敏、姚莉、龚秋霞、严华、白光、吴莺音、龚秋霞、李丽华、黄飞然、欧阳飞莺、陈云裳、梁萍、张翠红、李香兰等人争奇斗艳，演唱风格也由本嗓直声转向细腻柔美甚至揉入了美声唱法，作曲家与歌唱演员共同创造了中国流行歌曲一段群星璀璨的黄金岁月。中国的流行音乐也就由此进入了成熟时期。

流行歌曲无论其创作或演唱，都有格调高雅与庸俗，质量精美与低劣，生命力长久与短暂之分。尤其在战争年代与和平环境，社会封闭与开放的不同历史阶段，流行歌曲都有着不同的历史命运。占据着大众音乐文化的一席之地。

第十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音乐（下）

第十一章 王洛宾对西部民歌的搜集、整理与改编

第12章 抗日救亡歌曲

第13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歌曲

第14章 解放战争时期歌曲

第15章 新中国17年歌曲

1. 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薄的各类歌曲
2. 与政治运动和方针政策密切相关的歌曲

第16章 文革时期歌曲

第17章 改革开放初期歌曲（待续）

【怀人】

三十二年的情谊

——纪念我的阿姨徐阿凤

张保和（美）

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保姆或佣人被统称为阿姨。这篇短文讲的就是我们家的一个老保姆，我们称之为阿姨的徐阿凤。阿姨从1956年到1988年这三十二年中，基本都在我们家度过，和我们一家，特别是我和弟弟永和，建立了极端深厚的感情。她大约生于1906年，于1989年去世，终年八十三岁。下面就是一些关于她的故事。

刘妈

在讲阿姨的故事之前，必须先讲讲我们家的另一个老保姆，刘妈。这位刘妈可是我们张家的一位老资格的人物。她是宁波人，名字不详，没有孩子，本是我爷爷家里的老佣人。在1935年我父亲大学毕业后，从我爷爷家出来另立门户，刘妈就跟着我父亲。从此，她一直跟着我父亲，照顾他，和我父亲情同母子。我父亲曾讲过一个故事。在抗战中，我父亲的经济情况一度窘迫。他的钱都是放在写字台的一个抽屉里或他的一件上衣的口袋里。刘妈每次看到那个抽屉和口袋里空了，就把自己的钱放些进去。我父亲也知道自己没钱了，但一下口袋里又有钱了，一定是刘妈放的。但他也没作声，只是心里想将来一定要报答她。我父亲在1949年来北京时，刘妈当然也一道随行。

在我出生后，刘妈当然非常喜欢我，特别是喜欢抱我。但刘妈有肺结核，而且还是开放型。当时我母亲就非常担心刘妈会将肺结核传染给我，最后终于在1956年我弟弟出生后决定送她回宁波她的一个侄子家去养老，这一定是我父亲的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因为他本来是要为刘妈养老送终的。但另一方面是我和我弟弟的健康，这也是兹事体大。我长大后照的艾克斯光片显示我的肺上有钙化点，说明我已经染上了肺结核，只是没有扩散而已。刘妈走后，我父亲一个月寄给她二十元，直到她过世。刘妈大约在六十年代初过世，我记得我父亲寄了六十

块钱为她办丧事。

刘妈做的菜的味道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因为我那时才两，三岁，太小了。但记得我父亲说刘妈兜里总有一瓶味精，什么菜里都要放。这使我想起了我父亲讲过的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老太太信佛，因而吃素。她家里有一个厨子做素菜特别好。后来那个厨子因事离开了老太太家。老太太换了好几个厨子，都不满意。实在没办法，只好再去找那个老厨子，问他做素菜的奥秘。那厨子倒也老实，从实道来。原来他的素菜都是用鸡汤做的。看来，要将素菜做出鲜味来，还非要借助一些外力才可。刘妈看起来是深谙此道。

徐阿凤

到了北京后，刘妈岁数大了，除了做饭，已经不能胜任别的事了。于是在我出生后，就又找过两个保姆帮我妈照顾我。一个的名字叫淑贞，另一个是潘大妈，但他们在我两，三岁时就离开了。



在1956年四月我弟弟永和出生后，家里更需要人帮忙，我们家就又找了一个保姆，她就是徐阿凤，我们的阿姨。她是上海郊区常熟何市人。我记得她曾说小时候，她的父母要给她裹小脚，但她受不了，自己把裹脚布拆掉，所以保持了大脚。中国那个裹小脚的传统真是惨无人道。阿姨年轻时，嫁给了家乡的一吴姓男子。但因阿姨不育，丈夫娶了二老婆。阿姨因此一气出走。从此，她以帮人家为生，到处漂泊，一生（1965年，摄于北京家中）没有自己的家。从这两件事也可以看出，阿姨是个个性很强的人。

在1949年前，阿姨都是上海帮人家，但在1949年里，不知道什么人把她带到了北京。我弟弟永和出生后不久，我的一个舅妈就将阿姨带到了我们家。

刘妈一直沿用我爷爷家的习惯，称我父亲为少爷。阿姨刚来时，刘妈还在，所以也跟着刘妈称我父亲为少爷。后来这个称谓一直沿用了几十年，到阿姨过世。那时我父亲已经七十几岁了。他恐怕是世界上最老的一个少爷。

在家务事上，我母亲和阿姨有所分工。大致上，我母亲负责购买，主要是买

菜，我阿姨负责做饭，洗衣服。

阿姨的菜

阿姨做的菜是上海菜，虽然都是些家常菜，但非常可口。在上海帮人家，做上海菜应是最重要的基本功。所以她的上海菜做得好，也是非常自然的。她的拿手菜之一是狮子头，都是用砂锅烧。狮子头这道菜原料简单，基本上就是猪肉末，但做好了非常不容易。为了使其松软，肉里要加荸荠。但经过烹饪后，又不能散。现在的江浙菜馆大都有这道菜，有的做得很好，但有的做得也不行，主要是在松软上不过关。起码我还没有在人家里吃过像阿姨做得那么好的狮子头。

阿姨的另一个拿手菜是红烧蹄膀，又名冰糖肘子。因加了冰糖，其肉皮通红透亮，而里面的肉则又苏又入味。如将肥瘦相配，再沾上又咸又甜的肉汁，吃下去真是人生一大享受。在1977年或78年里，我弟有一次吃阿姨做的红烧蹄膀过量，导致急性阑尾炎。还到医院急诊开刀，弄得非常狼狈，成了家里的一个笑话。

有一次上海建筑设计院的院长赵深到北京开会，不去住酒店，而住在我家，就是为了我家里的菜。有时我父亲在外开会，食宿都有招待，还是要回家吃饭，因为外面的饭吃不惯。我父亲的要求其实也不高，但味道要对他的胃口，另外他不太习惯吃饺子，馒头之类的面食。他早饭或中饭最喜欢的是蛋炒饭或榨菜肉丝面。蛋炒饭也是一道极普通但做好了也不容易的菜。台湾的唐鲁孙先生对蛋炒饭也是百吃不厌，并在他的一本书里对蛋炒饭有详细的讨论。

阿姨做菜好吃的另一个原因是她的菜做的较细致。比如说，很多菜里都可以放猪肉丝，像香干肉丝，但肉丝的切法很有讲究。除肉要新鲜，部位要合适外，肉丝切得要细，肉里的筋也都要剔除，又要不能顺着肉纹的方向切。要做到这些很费时间。阿姨的主要工作就是做饭，所以时间相对宽裕。

除了那些家常菜，我父亲还喜欢吃两道菜，蒸金华火腿和清蒸鲥鱼。吃金华火腿时，还要将火腿里蒸出来的油浇饭。我父亲是浙江杭州人，这是典型杭州人的吃法。这种吃法不管味道如何，用现在的标准看，实在是太不健康了，让人想而生畏。所以现在这种吃法恐怕也变了。

吃鲥鱼也有讲究，那就是鲥鱼的鳞绝对不能去掉，否则味道一落千丈。我父亲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吃鲥鱼的故事。他有一次和几个朋友去镇江吃鲥鱼，好像

是在海边的一个什么地方。吃饭时，有一女子在他们周围徘徊，好像欲言又止。于是他们就主动上前问那女子有何贵干。那女子说，看你们吃鲑鱼太香了，也很想加入其中。我父亲他们就邀请她入席，那女子欣然入座，和他们一道享受了一顿鲜美的鲑鱼大餐。我父亲从未提到这个故事的时间，但应发生在四十年代。那时的风气应还不像现在那样开放，一女子几乎是主动要求和一帮素不相识的男子一道进餐，应不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那女子一定是特别馋，或胆子特别大，或两者兼而有之。

阿姨在北京住得时间长了，也学会了做一些北方的食物，像包子，馒头，烙饼等。但饺子还是不太行。她的馅拌的很好，但擀饺子皮和包还是较慢。家里不常吃饺子，一是费时间，而我父亲不爱吃。有时我父亲不在家时，阿姨也做饺子，让我帮忙擀皮。所以我很小学就会了擀饺子皮。

那时洗衣服没有洗衣机，都要有手搓，非常费力。阿姨洗衣服也非常有一套。在内蒙时，我自己懒得洗衣服。有时候一个月才洗一次，可能洗得还不干净。白色的衣服都成了灰色的了。1972年从内蒙回来探亲，将那些脏衣服都带来回来。我那时身上还长了虱子，脏的程度可想而知。阿姨洗特别脏的衣服都是用开水煮，用她的话说，叫“砸”，水里可能还放一些碱，但绝对没放漂白粉。对我的脏衣服，阿姨当然也是如法炮制，也可以将虱子杀死。经她洗过后，我的那些成了灰色的白衣服又成了白色，像漂过一样。在美国，我的太太钱蕙青特别爱干净，不但经常洗衣服，也常用漂白剂，让白衣服保持洁白。我倒现在也不明白阿姨是用什么方法把衣服洗得那么白的。

在文革前，有些殷实人家有钱，也有佣人做，家里做菜的水平应该很高。想起来，北京的谭家菜不就是家菜吗。文革后，那些殷实人家绝大多数都在经济上，甚至肉体上被消灭了，那些家菜也随之消失了。相比之下，我们家的菜在七十年代的北京应该属于上乘，甚至上上乘。那时要想吃得好，要有三个条件，有钱，有人会做，有时间去买菜。三个条件中，前两个比较好理解，但那第三条可能需要一些解释。在七十年代，由于文革影响经济，几乎任何商品都是短缺，包括食品在内。那时，一些较好的肉或蔬菜只要一拿出来，几分钟内就被一抢而空。因此，在北京的一些大菜市场里，像东单菜市场，西四菜市场，或朝阳菜市场，总有一些人在徘徊，一见到有什么好菜出来，就马上去排队，购买。所以，买菜非

常费时间。当时北京具有这三个条件的家庭应该为数不多，而我们家应是其中之一。我父亲负责赚钱，我阿姨负责做饭，我母亲的任務就是买菜，就是那些总是在菜市场里徘徊的人群中的一员。她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花在买菜上，有时候一天要跑好几个菜市场，非常辛苦。而我和永和和我们家的客人则是纯受益者。我们吃惯了阿姨的菜，到别人家吃饭，甚至到饭馆吃饭，都不一定吃得惯。

阿姨的爱好

因为没有子女，阿姨在常熟老家领养了一个女儿，吴美玲和一儿子，徐宝兴。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好像她的父亲也还活着。美玲姐姐因响应政府号召支援内地，从常熟去了西安。她的丈夫姓常，是名医生，但因早年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军医，在1949年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监禁多年。美玲姐姐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常爱珍和两个弟弟。因为她的夫婿的问题，美玲姐姐和她的子女也受到牵连，在各方面受到歧视，也吃了不少苦头。

阿姨的儿子宝兴本是一个地主家庭的孤儿，被阿姨领养。因阿姨出身是贫农，宝兴的出身就变成了贫农，当上生产队会计，否则绝对不可能。宝兴有时候也会给我们寄一些常熟乡下的土特产来。我记得他曾寄来一些自己织的土布。我母亲用这些布给我和永和一人做了一件衬衫。和洋布比较，土布的颜色单一，都是蓝色，门面较窄，质地较厚，较硬。现在土布恐怕早已绝迹，可能连穿过土布衣服的人也不多了。

文革中，大概在七十年代中期，宝兴曾给我们家写了一封信，用当时的意识形态把我们批判里一通，并要我们好好接受改造云云。无缘无故的去骂一个几乎不相识的人也是一件只有在文革中才会有的怪事，动机多种多样。有人是为了保护自己，表示与某人划清界限。也有的人是为了表现自己，为自己捞取一些政治资本。估计宝兴写那封信的动机应是后者。

我看了宝兴的信后很生气，马上写了一封信反驳他。写好后，将稿子给我父亲看。他看了后说算了吧，说不清楚。所以我写的那封信就没有寄。现在想起来，我父亲的眼光还是比我深刻的多。造成文革那种人与人之间互相斗争的状况的根本原因是那个产生文革的社会制度，去和某个人争论谁是谁非实在没有什么意义。

那时通讯都是靠写信，但阿姨不识字，有时候要我们替她写信。信的内容不

过是我一切都好等泛泛之言。现在想起来，她一定有很多话要说，但通过别人说一定受到诸多限制。除隐私考虑外，我们这些小孩的语言水平也很有限，不可能表达清楚。而我们也不想写，每次都是几句话敷衍了事。现在想起来，非常惭愧。

阿姨说常熟话，是一种和上海话近似的方言。她在北京居住多年，可以听懂北京话，可是一句北京话也不会说。我们家买菜主要是我妈的任务，但有时阿姨也会在家的附近买些东西。但因为别人听不懂她说的常熟话，她经常会和售货员吵架。这时候，她就非常生气，说为什么我听得懂你说的话，而你却听不懂我说的话。虽然阿姨不会说北京话，在北京生活多年，她也学会了一些北京话单词，但用常熟话发音，特别逗。比如说，北京话里有一个词，活该。阿姨学会了用这个词，但不会发“活”这个字的音，就将它发成“呼”，于是活该就成了“呼该”。主要是受阿姨的影响，我和永和都听得懂上海话，并可以讲一点。她还教我们唱过一个常熟的民谣。这个民谣很长，我们现在只能记住其中几句。第一句是“刚刚刚（马跑的声音）马来哉，隔壁大姐转来哉”。其中的另外一句是“什么炒虾，茭白炒虾，田鸡打死老鸦”。这个民谣没什么意思，只是对日常生活的一些描写。

阿姨没有文化，当然从不谈及政治，不过她说过一件事，却让我们大吃一惊。她说汪精卫是个好人，因为如果不是他出来组织伪政府和伪军保护百姓，日本兵不知道要多杀多少中国人。当时的汪伪政府主要在江浙区域，阿姨所说一定是基于她的感性认识。我在美国看到的五花八门的言论诸多，但还没有看到过说汪精卫好话的。阿姨的意见只此一家。现实永远要比大家的认知复杂得多。

阿姨也有自己的一个朋友圈，或者说社交圈，都是在王府井附近帮人家的保姆。但她们之间从不用名字相称。他们见面时，都用阿姐相称，但在背后，是用她们的家乡相称。比如说，如果一保姆是苏州人，大家就叫她“苏州人”，如果一保姆是安徽人，大家就叫她“安徽人”。那我阿姨的名字一定是“常熟人”。但阿姨有两个好朋友，都是常熟人，巧娥和秋红，都还是以名字相称。我在其他的篇章中曾提到过她们。保姆之间的话题多是他们东家家里的琐事。阿姨有时候也将她所听说的讲给我们听。比如说，她有一个朋友在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的前妻鲍蕙荞的娘家当保姆。鲍蕙荞的父亲鲍国宝是一著名电力专家，就住在我家附近的锡拉胡同。我们通过阿姨听到不少关于庄则栋和鲍蕙荞的事情。同理，我想我们家的事可能也通过阿姨传到外面不少。

阿姨在上海做过的一个林姓人家。后来林姓人家的二儿子林连荣到北京工作，也成了我们家的朋友。我们都叫他毛毛哥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直到我母亲2008年过世。不知他的近况如何。

阿姨爱看戏。当时在王府井北口金鱼胡同里有一家吉祥剧院，紧挨着东安市场北门，专门演京戏。阿姨经常带着永和去看戏。可能因为如此，永和小时候不但喜欢看京戏也喜欢演戏。当时小孩看戏不收票，阿姨经常抱着永和去看戏。后来永和长得越来越大，阿姨还是抱着他去看戏。有一次到了吉祥剧院门口，就被截下来了，人家说孩子太大了，需买票了。

阿姨也爱看那些悲惨的电影，用她的话说，就是“苦”的电影。她一边看，一边跟着哭。但看完了后，又总是说电影好看。现在想起来这可能和她的苦出身有关，容易对电影里悲惨的故事和人物产生共鸣。

我们家的亲戚朋友也都和阿姨相熟。我父亲特别喜欢留客人吃饭。如果阿姨喜欢哪个客人，那就没问题。但如果阿姨不喜欢哪个客人，她就会走进客厅，绷着脸说，今天家里没有“小菜”。客人就只好告辞。“小菜”是上海话里的一个独特的词，需要做些解释。在上海话里，中餐的菜统称做“小菜”，而西餐则统称为“大菜”。所以我阿姨说的“小菜”不只是指头台或冷盘，而是任何菜肴。

但如果是一个她特别喜欢的客人，她有时就会主动邀请他/她留下吃饭。所以，我们家的老朋友都很注意和阿姨搞好关系。有的人一进门，就先去厨房和阿姨打招呼，然后再去客厅和我们见面。因为阿姨的菜好吃，到现在，很多朋友还对阿姨的菜念念不忘。

阿姨和我们兄弟俩

因多个原因，我们兄弟俩人和阿姨有特别深厚的感情。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就是时光。从记事起，直到我们长大成人，她一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中间几乎没有中断过。我听说一些动物，像狗或猫，都和喂它们的人最好，即所谓有奶便是娘的情结。我们从小吃她做的饭长大，一定也有这种倾向。

另一方面，阿姨也特别爱我们，除了在吃上，对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也都照顾至微。比如说，北京的冬天非常寒冷。在冬天我们早上起来以前，阿姨就把我们的棉袄放在炉子边上烤，在我们起床时，可以穿上热衣服。



（以上的相片应大约在1960年冬天照的。从这张相片里可以看出我们和阿姨在一起时的绝对的安全感和信任感，而阿姨自己也显出了满足的微笑。）

另一个原因是阿姨不太用管我们，对我们没有什么期望，使我们在她面前较随便。相比之下，我母亲对我们管得较严。比如说，我母亲在钱方面管得很严，不许我们随便花钱。我阿姨也老嫌我母亲抠门。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我父母都去了上海避震。他们不在家时，家里的钱就由阿姨管。不过阿姨当家时，对我比我母亲还抠门。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一旦当了家，也就变抠了。

在我们家有一个规律。如阿姨和父母有任何矛盾，我和永和都帮阿姨，不管对错。如果父母之间有任何矛盾，我们都帮我母亲。其实我们想帮我父亲也不行，因为他不允许。如果我们一说话，父亲就会说，父母的事情，你们不要插嘴。这件事也显示了父亲的治家风格，他很注意维护我母亲的权威，即使在他和母亲的意见不同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父母在我们兄弟俩的心目中都很有威严，我们几乎从不和父母顶嘴或吵架。

上面所讲的多种原因使我们在阿姨面前，不必去掩饰我们的情感，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不用长大。而在父母面前，我们则需要长大，需要努力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离 别

在1962年左右，阿姨在洗澡时，发现她的右胸上有一个硬块。我父母马上

找我们家的一个朋友，时任北京同仁医院胸外科主任张天民给她看病。很快，她胸上的硬块被诊断为乳腺癌。因为阿姨的女儿美玲在西安一所大医院里工作，阿姨就去了西安做手术。我记得在阿姨去西安以前，我抱着她大哭，怕她不会回来了。但阿姨在西安的手术很成功，在大约半年后，又回到了北京。可想而知，我和弟的都高兴极了。

对我来说，去内蒙六年是一次离别。我在“内蒙”的篇章里曾讲到过一些从内蒙回家探亲的经历。在1980年6月，我去美国留学，这又是一次离别。

1986年夏天我第一次回国探亲，又见到阿姨。但那次只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1988年以来阿姨的精神一直不好，一检查，发现她又得了肺癌，而且已经是晚期了。因为在北京没人照顾，她又回到西安她女儿那里看病。

在1988年夏天，我从美国专程去西安看她，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星期。她那时住在医院里，我每天去看她。她见到我当然非常高兴，一度觉得病都好了许多。因为她那时已经卧床不起，不能给我做饭了，她在病床上指导美玲姐姐给我做了一顿饭。美玲姐姐的烹饪技术和阿姨没法比，但味道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那是阿姨间接给我做的最后一顿饭。



（这张相片是在我1980年6月离家的前一天晚上照的）



（这张相片是在1980年冬天，我弟永和在他赴美留学离家前和阿姨照的）

前面曾提到因为阿姨的女婿常医生被迫害，美玲姐姐一家也受到很大影响，像他们的孩子在教育，就业等等方面都受到种种歧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美玲姐姐的女儿爱珍曾给我讲她为她父亲寻求平反的艰辛经历。她四处碰壁，但没有放弃。她在讲她的故事时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我就拼了，就是孤注一掷，义无反顾的意思。最后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爱珍终于替她的父亲平了反，使他们全家后来有了较好的待遇。爱珍后来当过工厂厂长。又和夫婿一起做过生意，是一名非常成功的女性。

阿姨是贫农出身，美玲姐姐也一定是穷苦出身，要不然也不会被亲生父母遗弃，被阿姨领养，应当不在被革命之列。可就是这样的人和他们的子女也会受到牵连，受到迫害，让人无语。那次在西安，也和阿姨的女婿，美玲姐姐的夫婿常医生有所接触，感觉他是个很和善的人。他和美玲姐姐及其他家人一道，在阿姨的最后日子里，对阿姨照顾得很好。这让我一方面很放心，另一方面也很惭愧，因为自己并没能尽到照顾阿姨的责任。

在西安的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我最后一次去医院看阿姨。好像又回到了幼时，我趴在她的身上大哭，说只要和她在一起。这时，她反倒安慰我说，你大

了，阿姨不能永远跟着你。临行时，她还叮嘱了我几件事情。其中之一是要我像我的父亲一样，做大事体，意思就是要有所作为。原来，阿姨对我们也不是没有期望。出了医院，我一个人坐在路边，哭了好一会。

在我看她后不久，永和也从美国回去看她，这当然也让她非常高兴，使她的病情一度有所好转。当然那只是暂时的。在我们看她后的一，两个月后，她就去世了，终年八十三岁。

自从1989年阿姨逝世，三十多年匆匆地过去了。回想起来，我也没有能够按照阿姨的嘱咐，做成什么大事情。起码我眼前的一件大事情就是完成我的回忆录，尤其是这篇回忆阿姨的文章。可以想象，如果阿姨的在天之灵知道了，一定会说这不能算是什么大事情。但阿姨如果知道我和弟弟都非常想念她，她应也可以理解，因为她也一定也会非常想念我们。☛

2021年11月15日

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

【述往】

竹海葱茏（一）

——童年记忆

万润南（法）

1-01 宜兴万氏

我是宜兴万氏第二十代。这件事我在2009年才第一次知道。那一年的7月28日，我意外地收到了一位宜兴乡亲的电邮。他的来信非常客气，全文是这样的：

前辈您好！

我是宜兴万氏三房二十二世孙万进才，因宗族续谱之事冒昧打扰前辈，前辈为我族七房二十世孙，论辈份为我族祖父。此联系前辈情由有四：

一、修谱是族之大事，前辈为当代宜兴万氏第一人，烦请前辈赐书谱之序言，让家乡族亲沾前辈之灵气；

- 二、按世表格式撰写您父（十九世）及以下的个人世表；
- 三、希望您同意把《万歌涂鸦》诗集收录到宗谱的艺文录内；
- 四、希望您能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宗谱撰修。

已收集和整理的宗谱资料在你回复后即发给您，恳切盼望您的惠书。

敬问家安！

晚辈万进才

据我父亲说，宜兴万氏原来的族谱，装满了二人宽、一人高的书柜，本由大伯保存。文革中大伯受批斗，族谱也被破四旧了。

当时有朋友说：“可惜呀，这个文革！”

收到万进才的电邮，我喜出望外，原来我们老万家的族谱并没有“毁之一炬”。据说是因为我们老万家也有贫下中农，当时一看上面记载的都是自家的祖宗，就悄悄收起来了。如今社会讲和谐了，于是，差一点灰飞烟灭的族谱又重见天日。现在，宜兴万氏的后人要续修族谱了。

这对我们万姓子孙来说，当然是功德无量的好事。我立即回函同意了。进才也立即发给我他已经收集和整理的宗谱资料。

根据这些资料，我初步了解到宜兴万氏的来龙去脉和列祖列宗的事迹。

我们宜兴万氏的先祖，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毕公高。但我们在宜兴的历史，可没有这么久远。据家谱的记载，我们万家是六百多年前，元末明初，为了避乱，从凤阳（今安徽省定远县朱家巷），逃难到宜兴的。

当时逃难到宜兴的，是兄弟俩，长兄万胜，字默庵；幼弟万得，字南庵。他们是宜兴万氏的第一代。我们家是南庵公一脉。到我，已是第二十代。其间，宜兴万氏人才辈出，每一代都有个把读书种子。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1-02 我的出生

宜兴在太湖的西厢，山清水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可是个好去处。宜兴有两样东西闻名于世，一是紫砂壶；二是善卷洞。紫砂壶告诉你什么叫古朴大方、工艺极品；善卷洞则向你展示山中有洞、洞中有河、雾气缭绕、奇石玲珑的人间仙境。

善卷洞边上有个张渚镇。1946年10月29日（农历丙戌年十月初五），我就出生在这个小镇。

后来我在家谱上发现，宜兴万氏第一代南庵公（万得）生于元末至正六年、丙戌年十月初五（公元1346年10月29日），我和这位嫡亲先祖同一天生日，同样的属相，正好相差600年。

母亲说，我出生的时候是自己踢破羊水，双脚先出，两手抱着脑袋，顺顺畅畅来到这个世界。

据说，郭沫若也是以脚先下地的方式降生的。郭大诗人比较矫情，非要说“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叛逆者的第一步。”

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就他自己而言，晚年痛失爱子仍要强作欢颜，这种逆来顺受离“叛逆者”何止十万八千里。而且，这种分娩方式被认为是难产，助产士遇到这种情况，要把婴儿的脑袋转向一百八十度，脑袋先出才是顺产。但高风险往往带来高收益。我认为这种特殊的出生方式，如果顺利，反而让婴儿受益非浅。

一般来说，分娩过程会不同程度造成婴儿脑部缺氧。缺氧的结果是造成脑细胞死亡。我的这种出生方式，基本上避免了脑部缺氧的过程，这就存活了更多的脑细胞。脑细胞相当于计算机的存储单元，这就使我有足够的存储空间去存放那些多余的信息，当然，其中有许多是垃圾邮件。

1-03 出门迷路

我很晚才讲话，认字却很早。在我连话都讲不清楚的时候，就会写不少字了。有一次在家门口走丢了，因为写了两个字，引起了行人注意，才被领回了家。

那年我也就三、四岁，家住在上海杨树浦，是那种外表千篇一律的工房。那天我在家门口玩，看到了什么新鲜玩意，跟着多走了几步，一回头，就找不到家了。每一个门洞都像，但哪一个都不是自己的家。我辨认了一次又一次，就这样越走越远。

我没辙了。孩子都有自己在面临困境时的制胜法宝，那就是哭。我也不例外。这一哭，把警察叔叔哭来了。警察和颜悦色地问我：“你家长是谁呀？”

我的回答让他感到意外：“不知道，但是我会写。”

“呵呵，会写字？”他笑着随手捡了一块石灰疙瘩，指着马路牙子，对我说：“那你就写吧！”

我蹲在地上，刚写了两个字，就碰到地面上的一个窟窿，于是不知所措地停了下来。这时候已经有一大堆人围上来看新鲜。

“怎么了？不会写啦？”警察依然和颜悦色。

我嘟囔了一句：“写不下了。”

警察扬起了眉毛，回手一指：“怎么？这么大一条马路，还写不下你爸爸的一个名字？”围观的人群哄笑了起来。

这时候，人群中一位邻居大姐姐认出了我。便由她带路，警察护送着，回到了自己的家。

1-04 说文解字

我小时候说话晚，可能同我听力不好有关。我的左耳先天失聪，所以我从小就是独耳听世界。

有人说，独眼看世界，就是毒眼看世界，不仅看得深刻，而且还有那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潇洒。

独耳听世界的好处也多多。首先是听得真、记得牢。别人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我是一只耳朵听进来后，就出不去了，所以记得特别牢。更幸运的，我是左耳听不见，这对我政治品格的形成贡献良多。我天生就不接收来自左边的信号，所以我从来不犯“左”的错误。我只倾听右边的声音，所以是先天的“右派”。

以上当然只是一些玩笑话。一只耳朵听，得到的语言信息也比别人少一半。语言这东西，只有听明白了，才能表达出来，所以我说话就晚了。另外，音乐世界对我来说永远是“单声道”，我永远体会不到立体声音乐的优美，这便是只耳朵的可怜之处了。

母亲看到我迟迟不能讲话，能说几句也是含糊不清，稍稍有点担心，从小就叫我“大头痴”。但教我认字没有障碍，也就放心了不少。有一天，母亲教我认了“刀”，又教我认“分”。我指着“分”下面的“刀”，说“一把刀”，又指着“分”上面的“八”，无师自通地解释道：“一切两半瓣”。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说文解字，那一年我三岁。

1-05 外公分鱼

我五岁就上学了，念的是半年级。在外婆家，江苏宜兴新芳桥黄珩村，上的是离村一里地的英驻小学。

外婆家所在的黄珩村很小，也就是十来户人家。前村朝南，有一条前塘河，村后是后塘河。村子就夹在两条河的中间。村东头是一座土地庙，村西头是一个土墩，长满了一人高的茅草。茅草丛中间辟出了一条路，这是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

沿前塘河有一排民房，大部分村民住在这里。隔了村中央的一片宽阔的“场”，靠后塘河有一栋全村仅有的楼房，那就是我外婆家。楼房和后塘河之间是菜园，菜园的东边是一大片竹林。西边则毗邻一排平房，那是我小舅公家。小舅公是我外公的小弟弟，年纪要小很多。因为他的独子光浩——我要叫他舅舅——却是跟我同岁的小学生，我们一起上半年级。

前塘河是全村的公产，后塘河则归我外公和小舅公两家所有。河里放养了许多鱼。每年都有一次干塘，就是把河水抽干，把全部鱼都捞上来。分鱼是全村的盛典，主持人则是我外公。

外公把捞上来的鱼按全村的户数分成十几堆，同时用麦秆做成十几根签，草签长短有序。每户派一个代表来抽签，我外公自己则不参加。

然后每户按自己所抽得的签，由长到短依次抱走自己中意的那堆鱼。全村人都抱走了，剩下的最后一堆谁也不要的，就归我们家了。

我睁大了眼睛，饶有兴味地观察着全过程。后来我体会到：这就是如何主持公众事务的一个案例。操办公共行政事务，主持人要有公信力。要取得众人信服的关键是要肯吃亏，不能与民争利。如何做到公平和公正，要有恰当的程序设计，这就是所谓程序正义。

童年的记忆，往往能影响你一辈子。后来我主持四通，当许多四通干部都分到了大房子，我却给自己留一间；在管理上设计了“五定两挂钩”等公平、公正的考核规则，都依稀可以看到我外公当年的影子。

1-06 上街赶集

我在乡下念书的那几年，外公的生活过得悠闲而潇洒。他生于1905年，属蛇，那时候他也就五十岁左右。在我记忆当中，外公很少下农田，除了偶尔出面主持村里的公众事务，日常活动主要是上街、饮茶、喝酒、看戏，顺便替家里买些油盐酱醋。

上街，就是到新芳桥去赶集。从外婆家往南走七里地，就是乡政府所在地——新芳桥——一个相当繁华的小镇。镇上有茶馆、酒楼、戏院、百货店、中药铺。对了，药铺的字号叫“向德生”，我的小舅婆，光浩的母亲，就来自这个家族。

周末，外公会带我上街，这是我最开心的日子。沿街的小吃：入口即化的酥糖、豆沙馅麻球、馄饨摊……只要路过，我就赖着不走，外公总会依我。还有各种玩具：两根竹管叠起来，安上一个机关，摇起来啪啪响的机关枪；各种面具，我记得有过一个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我们老家管面具叫“鬼脸壳子”；我还有过一只匣子上镶着两条金龙、木质剑身漆得银光闪闪，拔出来是双柄宝剑。戴上“鬼脸壳子”，舞着双剑，从村东头舞到村西头，我当年在外婆家还着实风光过一番。

我还跟着外公看戏。经常上演的是滩黄（锡剧）和绍兴戏（越剧）。滩黄戏多是帝王将相；绍兴戏则多才子佳人。外公很惊讶我居然也看得懂。一位长胡子、红脸膛、舞着大刀의武将出场，我就告诉外公：“这是关公！”一位师爷模样的布衣出场，在关公袒露的右臂上比划一番，关公则端坐不动，专心看着左手托着的兵书。我就说：“这是华佗！”至于他们咿咿呀呀地唱的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

在回家的路上，我告诉外公，关公和华佗，都是我从小人书上看来的。于是，外公就开始给我讲三国、讲水浒。还教我念诗，什么“床前明月光”，什么“独钓寒江雪”。外公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

外公经常说：金山、银山，只有子孙出息才是靠山。外婆家土改时评定的阶级成分是中农，原因是我外公有三兄弟，分了家，每家名下的地并不多。生活能过得相对舒适，享的是子女的幸福。外公的五个孩子当中，我母亲是老大。父亲在上海银行工作，工资不算低。把我们寄养在外婆家，每个月都要寄相当的生活费。我有一个姨在香港。姨父、姨妈虽然只是普通打工仔，但不时从香港寄回来的那

些食品和衣物，都足以让我们乡下人惊艳。我还记得小时候大姨回来探过亲，不说那些带回来的琳琅满目，光是随身用的那一卷粉红色、带着香水味、细腻、柔软的卫生纸，就让我至今都印象深刻。“这么漂亮的东西居然用来擦屁股！”为此我愤愤不平了许多天。

虽然实际生活水准要比村上的地主、富农好得多，但外婆家在村里一点都不招嫉，而且非常受尊重。究其原因，是我外公厚道、外婆广结善缘。关于他们，且听下回分解。

1-07 我的外公

我母亲经常说：一个家哪，要一个馒头搭块糕。意思是说，两口子之间，一个松，另一个就得紧；一个甩手，另一个就得操心；一个悠闲，另一个就得辛劳。

在外婆家，既然甩手悠闲的是外公，那操心辛劳的就只能是外婆了。我至今还记得一件小事：深夜，瓢泼大雨，天井里的排水沟堵上了，积水已是一片汪洋，再不疏通，雨水就要漫到堂屋里来了。外公晚上照例喝了点小酒，也照睡不误。操心的外婆喊了声：“老头子啊！”老头子鼾声如雷；外婆便推一下外公，外公翻了个身，继续鼾声如雷。外婆叹口气，自己爬起来，戴上竹笠、批上蓑衣，冒着大雨，疏通排水口。这一干，就是小半夜。外婆全身湿透回到房里，大雨依然瓢泼，但落在天井里悦耳但却让人担心的叮咚声，已转为急促的噼啪声。外公那里，依然是如雷的鼾声。

外公少不了受数落，但从来不回嘴，坐在那里，静静地听、憨憨地笑。等外婆说够了，外公起身搭上长篮，请示一下需购置的项目，转身又上街了，继续他的潇洒。

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外婆操心。不仅是家事，村里的事，也归我外婆操心。东家娶妻了、西家生子了；这家没米了、那家缺柴了，外婆都要帮着张罗。凡有上门告贷的，外婆一般都有求必应。每年秋天，外婆家咸菜都要腌几大缸，我寻思全家怎么也吃不了这么多呀。开春了，外婆就打发我们去做散财童子，挨家挨户去送，虽然只是一碗咸菜，但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可是雪中送炭啊。

村里最穷的，是两家外来户。一家是打渔佬；一家是刨烟佬。打渔佬叫王二小，原来安家在上船；刨烟佬姓韦，则是靠自己的手艺带着全家盲流的那种。共

产党领导他们翻了身，给他们分了地，在村上安了家。安一个家，什么都得从头来，谈何容易。给他们最多关心和帮助的，是外婆。

刨烟佬在土地庙的西厢房安家，村里人担心会不会冒犯了神灵，都来找我外公商量。外公沉吟了一下，然后说：“没关系的，因为毛泽东的星宿大，压得住的。”

外公一言九鼎，老韦家安心住了，村里人不担心了。我也刻骨铭心地记住了一句话：“毛泽东的星宿大”。

1-08 我的外婆

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差不多都看过《沙家浜》。里面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沙奶奶，一个是阿庆嫂。把这两个人物形象叠加起来，就是我心目中外婆的形象。

阿庆嫂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外婆家的八仙桌，摆的是流水席，招待的是乡、村干部。一到晌午时分，一队人马，摇摇摆摆过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帽子往左边斜，脖子朝右边歪，挎着一杆汉阳造，那是民兵队长顺根伢。

村干部领着乡领导到田头转转，渴了、饿了，就转到外婆家了。外婆忙着烧水、做饭、递烟、摆点心、上饭菜。一个个吃饱了、喝足了、一抹嘴、拍拍屁股就走了。在他们吃吃喝喝的时候，顺根伢会让我摆弄他那杆从来就没有子弹的汉阳造。我把枪栓拉开、合上、扣扳机，一遍又一遍，感觉好极了。

穷亲戚来了，外婆的招待更热情。除了好吃好喝，还安排住下来。记得三年大饥荒时期，在楼上打地铺的，满满的有一排人。

对流浪来村里安家的刨烟佬，外婆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帮助。人们常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刨烟佬的儿子叫韦金龙，女儿就叫韦金凤。金龙和我同岁，长得孔武有力。外婆待他，如同自己的亲外孙，好东西有我一份，也有金龙一份。出门时，外婆会把我们拉在一起，嘱咐我们：“大家是好朋友，要互相照应。”我明白，外婆是用心良苦，怕外面有人欺负我，帮我找了个保镖。

金凤比我们大四、五岁，十岁的小姑娘，已经长得亭亭玉立，齐肩的长发。因为缺乏营养，脸色略显苍白，衬得黑眼睛格外明亮。我和金龙去念书，她也跟着我们上学。我坐在第一排，她坐在最后一排。

为了表示尊重，村里人都跟着我管外婆叫外婆。两口子吵架了，找外婆评理去！家里有难题了，找外婆商量去！外婆经常说：富不骄横、穷不矢志。总是把别人看得很大，把自己看得很小。外公敦厚、外婆睿智，我认为他们配合得珠联璧合，外婆却说，外公和她生肖相克。

外婆小外公一岁，属马。外婆总说外公和她是蛇盘马脚：相克。其实，相克才能相生。老两口相濡以沫，一起活过了跨世纪。2001年，外公以97岁高龄离世。三个月后，外婆就平静地走了，在睡梦中，安详得像在熟睡。也许，没有蛇盘脚了，外婆觉得不习惯了吧。

外婆年轻时身体并不好，因为操劳，面黄肌瘦，早就是一头白发，白得一尘不染。晚年时，两鬓反而长出黑发，皮肤白里透红、如同婴儿。传说中的“返老还童”，还真有其事。直到最后一天，外婆脑子都极为清楚。看到村上她那一辈都走光了，下一辈也走得差不多了。外婆说：“唉，活得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只有看透了人生，才能有如此的智慧，才会有如此的洒脱。

1-09 三大帅哥

我外婆年轻时候一定很漂亮。五个孩子当中，大舅最像外婆，而我大舅可是村上公认的大帅哥。

村上有三大帅哥：老师哥叫戴锁才；大帅哥是我大舅；小帅哥是我二舅公家的小龙舅舅。他们帅得不一样：老师哥有点像梁朝伟，尤其是那种忧郁的眼神；我大舅依稀当年赵丹的模样；小龙舅舅则有点刘德华的影子。

他们不仅帅气，而且都有一副好嗓子。但他们唱的也不一样：戴锁才唱的是山歌；大舅唱的是洋歌；小龙舅舅唱的是花腔小调。从唱腔上分，一个是民歌；一个是美声；另一个则相当于现在的流行歌。

我至今还记得戴锁才唱山歌的场景。抬水车是农村的一件重活，要十来个壮劳力同步用劲。这时候，我外婆会提着牛鼻茶壶，站在一旁督阵。

大家就位以后，外婆就会下指令：“锁才伢，唱！”

“嗨哟来……”这一声，高亢得直上云端，能传出几里地外。十几个人跟着合唱：“嗨哟！”

“嗨嗨哟来……”这一声转为低沉悠扬。“嗨哟！”，众人跟着低沉。

我后来再也没有听到过如此好听的山歌。从高亢到低沉，婉转得如行云流水；从低沉到高亢，过渡得九转十八弯。那旋律，不亚于阿炳的“二泉映月”。当然，前者有更多的阳刚，后者则有更多的悲情。

戴锁才有个女儿，叫君英，比我大四岁，是村上最漂亮的姑娘。小时候，母亲也会同我开玩笑：“大南啊，将来你要娶谁当老婆呀？”我就用小手指向君英。当然，后来我没有娶到君英，因为她嫁给了小龙舅舅，成了我的舅妈。

小龙舅舅和君英订亲的时候，记得是我上大学后的一个寒假。当时小龙舅舅在部队当兵。他也是回家过春节。探亲后，我们相约一起离村，到新建去坐轮船，他去南京，我去上海。君英送我们到新建。我们一起在新建住了一夜。黄昏时分，烟雨朦胧，小火轮喘着粗气带我们离岸时，君英在桥头不停地向我们挥手。此情此景，有诗记之：

《江南烟雨》

人在石桥头，黄昏送远舟。
渔歌随晚唱，暮鼓伴离愁。
淡雨濛濛下，轻烟冉冉收。
江南伤别夜，一曲暗香流。

他们后来全家移民到纽约。一九八四年，我从科学院被公派到佛罗里达大学当访问学者，途经纽约，还专程去拜访过小龙舅舅和舅妈。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一对翩翩美少年，比他们老子当年更帅。

当时我心里感叹了一句：愿天下俊男美女皆成眷属，其后代绝对是优良品种。

1-10 怪力乱神

子不语怪力乱神。外婆家离孔圣人老家远了点，富乡僻壤，教化所不及。所以在乡下，我听说过许多怪力乱神。

江南水乡，自然多水，水中有鬼，俗称淹死鬼。我不仅信其有，而且是亲所见。当然，我见到的淹死鬼，不是它的本尊，而是它的变身。河塘里有一种水草，会开一种非常漂亮的黄色小花。村里人告诉我，这种花就是淹死鬼变的。

开始我也是将信将疑，直到村东头一对小兄弟让变成黄花的淹死鬼拖了去，从此也就深信不疑。俩兄弟在河边玩，弟弟想摘河里飘着的黄色水草花，不小心滑了下去，哥哥伸手去拉，也跟着沉到河里。

村东头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喊，我们闻声过去，这对小兄弟已平躺在门板上，灌满水的小肚子胀得滚圆。人们徒劳地压着他们的肚子往外控水，但俩兄弟已经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

从此我对水中漂浮的黄色小花，怀有深深的恐惧。

还有一种我们村上独有的磨哀鬼，则是我亲耳所闻。深更半夜，夜深人静，村西头会传来一种凄厉的声音：叽哩呱……咕嘟……叽哩呱……咕嘟……村里人说：这是磨哀鬼在叫。传说村上有过一个童养媳，婆家逼着她没完没了地推磨、舂米，最后被虐待致死。冤魂不散，变成了磨哀鬼。

有一个晚上，我和舅妈、小姨，三个人睡在楼上大床上。突然，舅妈问小姨：“听见没有？”小姨问我：“听见没有？”大家都听见了：叽哩呱……咕嘟！叽哩呱……咕嘟！清晰得让人毛骨悚然。据说鸵鸟遇到紧张，会把头埋在沙堆里，我们也是出于这种生物本能，把头钻到被窝中央，憋得透不过气来。

从外婆家往南走一里地，是去新芳桥途中的第一村，叫塘门廊。路右边是一条灌溉渠，路左边是一座庙：白鱼娘娘庙。每年发大水鱼汛期间，会有不计其数的白鱼逆水游上来，在小小的灌溉渠里堆得层层叠叠。据说它们都是来朝拜白鱼娘娘的。

又是一个关于童养媳的凄美传说。有一家买了一条大白鱼，让童养媳到河边去宰杀。刚划开肚皮，白鱼就流眼泪了。童养媳不忍，就把白鱼放生了。回到家里，自然不好交代，于是被毒打致死。死后，童养媳被草草埋葬在乱石岗。以后每年大白鱼会带着子子孙孙来这里朝拜。细心的人们还发现，白鱼的肚子上有一条浅浅的黑线，据说这就是当年留下的划痕。

当地的人们出于敬畏，在乱石岗上修了一座庙，这就是白鱼娘娘庙。❏

【述往】

吃瓜子的故事

言真

“谁吃的瓜子皮！”这是我上初一时班主任的一个著名的病句。当然，同学们只敢在背后笑话他。

当时同学们年龄小，爱较真，班主任站在讲台前，气得涨红脸反复大叫：“谁吃的瓜子皮，站起来！谁吃的这一地瓜子皮？！”愤怒的声音震荡着，却没有一个学生站起来，大家屏气息声坐着，任凭老师越来越生气，不断指点着地面，手指直哆嗦。

第二天我来上学，才知道昨晚的这一幕，预感将大祸临头，不由得埋怨：“你们怎么不早点站起来？”吃过我的瓜子的她们，异口同声地喊：“谁吃瓜子皮啊！”满脸坏笑。

这不是诚心跟老师较劲吗？

后来，一个软骨头班干部，顶不住了，蔫蔫地站起来，多米诺骨牌倒塌，一个一个站起来，男同学女同学竟黑压压站了一教室。这景象外加教室里水泥地上白花花地铺满瓜子皮，晚自习课也就变成了整风运动。

一阵雷劈电闪之后，老师发泄够了醒悟过来，开始追查瓜子来源，没有任何抵抗和犹豫，大家马上供出我，铁案如山啊。第二天早上居然还有同学跑到校门口热心提醒我。

“吃瓜子皮”的确是个病句，不合情理，身为老师将这病句喊了不下于二十次，他可能也惭愧，反正没再提起这事，一天、二天，多少天之后也没找我的麻烦。不过，我却从此明白，仕途被毁了。

按照校规，住校生不允许吃零食，不允许出校门。可我不是住校生，所以能自由出入，却带来零食散发，显然错在我。老师肯定认为我严重缺乏自觉性，不是当干部的胚子，现在想想，老师看人可够准的。

可是那时我十三岁，个子还没长起来，能有多大的衣兜？也就是挺义气地给一二好友分发了两三把葵花子，竟然全班都吃遍了，不可想象。受此打击，我很自卑，不写入团申请书，其实写了也轮不上我。

尽管成了臆想中的落后分子，瓜子带给我的损害不算大，因为10个月后就

文化大革命了，团员成了保皇派，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所以嗑葵花子我还是觉得满口留香，那时好像偶尔才有瓜子吃，很难对它有坏印象。

不料到了兵团后，瓜子仍成了我的绊脚石。

在兵团，崭新的开始，有资格要求进步，当然必须先写申请书表达殷切希望，无奈那时红海洋、阶级斗争、政治挂帅闹得晕头转向，早没了纯净的虔诚，拿起笔来竟没能有一句发自肺腑的话，神圣感全无，对着“入团申请书”几字愣了半晌掩卷作罢。

可以说，我的革命经历，始自“入”字，止于“书”字，仕途更谈不上。

当然，漂亮话必须说，那是生存需要，开会发言表决心，不怕苦不怕累战天斗地，等等，硬装成喜欢苦、累、战、斗，嘴上还来点假招子：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实际，内心里既讨厌吃苦又惧怕受累，尤其受不了天天挨饿，成天幻想着营房后边的小树林里能有个百货大楼。

谁能拗得过天性？吃，是动物的第一需要，所以，每天早上，瘪瘪的肚子里晃荡着糜子粥，肩上挑着扁担筐，意气风发上工的路上，满脑子想的并不是解放全人类，而是好吃的东西，大米饭炒鸡蛋、一个肉丸的饺子、香喷喷的葵花子。。。。全都像共产主义一样可望而不可即呵！

葵花子不是没有，田地沟渠边种着不少向日葵，生长得分外壮硕，盘子肥大厚实，但是不让吃，可能需要去支援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劳动人民。

看见它们，我的记忆复活得更强烈，想到的就是一个字“香、香、香”，最后导致下定决心，偷！铤而走险，管它呢！

连长是谁呀，人精，能让人偷？他一气之下把丰收在望的瓜田给犁了，就因为偷生瓜的人太多，打架斗殴的。这次防守得紧，葵花盘终于安全收获回连，还要晒它。人精就是人精，连长命令把它们全扔上连部的房顶，连部！在眼皮底下晒，看谁敢偷，敢偷就再捆起来扔库房关着！

真唬住人了，葵花盘们长长铺开安然地在房顶上聚集多日，很招眼，连部在营区中心位置嘛，下工回来的路上，远远就能看到它们，更坚定了我的决心。

无知才能无畏，我压根不了解有多么危险，四十年后才知晓曾有人被捆过。偷的计划简单得很，总要有全连政治学习吧，连里领导要坐在台上吧，人都集聚

在礼堂我溜出去偷不是正合适嘛。

光天化日的我就付诸实施，退出会场回到我们女排宿舍与同案犯会合，那时我干事喜欢结伴，这姐妹牛气冲天与我正对脾气，此时已经先期溜出会场在宿舍等我，背包带也按事先商量的给准备好了，临出门，她草鸡了，眼光游移地看我，问，真去啊？

我大惊，不去还行？去！

这就透着不祥，谁知更有出师不利的事，刚贴边走出不远，后排宿舍就有个女声喊我：“小慈、小慈”，我俩吓得加快脚步朝前赶，一边慌张回头望，是另一个女排的战士，放心了，不是排长不是班长，不理她。那位也够拧，提高嗓门大喊：“你们干嘛呢！”

她就不怕满礼堂的人听见？只隔着一个小操场。恨得我只能低声连骂：“真讨厌！”，不屈不挠赶路，终于穿过空旷地转到一排排土屋群里，躲过了程咬金。

连部前果然静寂无人，它面朝篮球场和宽敞平坦的土路，一览无余，房背后则是众人开会的礼堂，地理条件实是地理条件实是不好。此时顾不得那些了，兵贵神速，我甩开背包带往房顶上扔，想勾下几盘葵花，不行，那背包带轻飘飘地自己滑下来，一点儿不争气。几回回失败，我同伴再次崩溃，声声催促：“算了，算了，走吧！”。

不甘心呵，我东冲西撞终于在地上寻到一小截干树枝，绑在背包带的一头，仰脸再扔上去，成功，勾下一个小盘，太阳光晃着我的眼，急忙让同案后退几步看清楚，指点着，又勾下一盘巨大的这才满意，真是贼胆包天。

此次冒险委实顺利，也令人失望，因为盘子上的生葵花子根本不香，第一次懂得瓜子要炒熟。那也照吃不误，掰成数块分给几个好友，中学的教训没接受。

唯有再三叮咛：千万不能吐一地瓜子皮！

顺便交待一下，这次偷窃很少见地损害了大家利益，春节时瓜子被炒得香香的分给各排吃，大出意料。

我倒并不内疚，只不过，从此踏入歧途，自认为是落后分子，说啥也不想假积极了，有什么自私之处也不再起劲地掩饰，总之，革命意志衰退，自我解放了。

前年在母亲家翻旧物，突然发现一张黄旧的五好战士奖状，很惊奇很意外，是我的，71年发，可见那时我干得很苦，并不落后，为什么不记得自己当过五

好战士反而念念不忘偷东西的事？

我想，无论人性弱点多么不体面，只要是最自然无邪的流露，总比道貌岸然可贵，虚伪的进步远不若真实的落后禁得住时光的过滤吧。

那种窒息人的最自然需求的虚伪生活怎么值得恒久记忆？我只记得偷瓜子不记得五好战士。📷

【述往】

我所参加的文化大革命（五）

杜钧福

十九

1967年院里的内战刚告一段落，争论的重点又转向了三结合问题，就是说，院革委会结合哪一个或哪几个干部。66年底，原来的以张劲夫为首的院党委被宣布为反党集团，至少在眼下是一个不能结合的。现成的干部倒是有一个，就是刘西尧。

刘西尧原是二机部副部长，文革开始后来我院当总理联络员，按说是能结合的，但现在出了问题，就是我们《红联》反对。我们认为，在内战问题上，他处理不公，偏袒一方。我们反对，《造反团》自然就赞成了。于是发生争执。

我自己当然是站在《红联》的立场上了。但我总觉得，我们反对结合刘西尧的理由不充分。他在内战中偏袒一方也算不得什么大错误。于是我给我们的头头王桂芹出主意：我们应表示同意结合刘西尧，但要他作一个检讨。我估计刘是不会做检讨的，《造反团》也不让他作。这样我们就有了理。

当时周总理在国务院召集各所代表开了几次会讨论这一问题。双方都很紧张。代表去了以后，大家都在所里等结果到很晚。有一天午夜，忽然传来消息，说与我们对立的力学所《红军大队》派了两卡车人进城。我们怀疑他们是不是去向总理施加压力。于是我自告奋勇进城侦察，乘所里一个人驾的摩托到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转了一圈，没看到什么人。我们正想打电话的时候，看到所里开来一辆卡车，都是我们的人。原来他们不放心，就都来了。回去后才听说，这个晚上，有《全红》或《红总》的人进城。《造反团》的人怕他们捣乱，派人也进了城。我

们不明真相，也派人进城。幸亏没发生什么冲突。

但最后刘西尧未被结合。但这似乎不是我们反对的结果。原因可能来自二机部。我们原来不知道刘西尧在二机部的情况，到了67年春天才知道，原来他在运动初期也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至今还被二机部造反派揪住不放。

不但刘西尧没能结合，两派联合的调子也没那么高了。似乎有一种承认两派客观存在的看法，只是希望不要再有更多的派。于是在1967年夏天，已经解散了的战斗组又重新成立起来，当然阵线有所变化。这时，在院内连同红联在内，共出现了六个红。现在，要求这六红变成一个红。当然未能具体操作，因为后来形势又有变化。

7月30日，我院在人民大会堂开革委会成立大会。周恩来总理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宣布，粟裕为我院革委会主任。这实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粟裕历来和我院并无渊源，文革以来也没过问过我院的事。当然也没任何人反对他。粟裕在会上露了面。但实际上，他只是名义上担任了这个职务，实际没起任何作用，后来名义上也不提了。中央又派周荣鑫来院，但事实上是柳忠扬、王锡鹏掌权，直到1975年胡耀邦他们来院。

当时的人民日报也刊登了我院革委会成立的消息，还发表文章对我院大联合三结合表示肯定。

所里当然也要找个干部结合。原党委书记张成美还没解放，而且看样子一时得不到解放。原因我不太清楚，他在这个所里好像没什么根底。除去张成美，就剩副所长郭佩珊了。郭是文革前刚从科学出版社调来的，没人对他说出什么意见。他在文革初期也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具体地说就是到我们室来向积极分子布置叫我们这些反党分子说话，不说话就定不了性。但不知为什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没人批他。

他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是刘西尧的同学，很早参加革命，曾受董必武的领导，一直在国民党空军里搞地工，曾策动起义占领昆明飞机场，为推动昆明解放作出贡献。他为人比较耿直，老板着脸，和群众有距离，领导也未必喜欢他。他在解放后在东北因不买苏联专家的账而受过处分，所以至今级别也不高，比刘西尧差远了。

在文革里，他没对各种问题表示过意见，但“竞选”时发表了一种马的理论，

说马有四条腿，但四条腿的未必是马。运动初期造反的有左派，未必都是左派。这道理当然是对的，但我认为他阐述得有问题，就写了一张《驳郭佩珊同志马的理论》的大字报。他看了后，找我谈了一次。选举时，有人问我是否支持郭佩珊。我说是。他说你不是反对他吗？我说反对他的某一说法不等于反对他。当时人的想法就是如此绝对。

郭被结合后，鉴于当时的条件，并未发挥很大作用，但也从未听说他的作风有不端正的地方。但他的结局并不好，很值得叹息，因为本不该如此。

我们这些激进派本来还有另一候选人，是个中层干部，比较支持我们。他似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后代，在毛主席像旁贴对联，说什么贫时吃苦甜如蜜，就是翡翠白玉汤的意思，后来被打为反对毛主席。这个人可能不是坏人，但绝对没能力。

室里也要找一位干部。和我们对立的一方想找一位女干部。为什么找她，我们不明白。但既然他们想要，显然有利于他们，所以我们不想要，但也没什么理由。但后来谢天谢地，她另有任用，不来了。我们又找了一位，就是原保卫处处长刘俊才。他就是运动初期贴大字报说我们研究生是“头顶红布，手拿尖刀的三家村黑店64级分店”的那位。我们认为，跳出来的未必坏，对他并无恶感，也从未批判过他。他也是打游击出身，但对古典文学有兴趣，文革前上业大中文系。院保卫部宫震部长很不高兴，说物理所的保卫处长怎么老念古文。我们认为，爱好古典文学的干部不可能是整人的干部，就同意了。他来了后，经常和我们说些笑话什么的，没架子，当然也没起什么作用。

当然在革委会群众代表人选上也有很大争论。院里是一所一位代表。所里哪派势力大就选哪派代表。所里我们派占优势，在所革委会里也占优势。室里也大致如此。

二十

1867年8月底9月初，文革局势发生很大的变化。

这场政治风暴似乎开始于8月23日毛泽东女儿肖力在解放军报社贴大字报并随之揪出该报负责人赵易亚。27日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抄了林杰的家。31日清华井冈山知道王力、关锋垮台的消息，就抄了穆欣的家。随着“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被批判。一些著名造反派如学部红卫兵联队也出了

问题。不少人认为造反派从此该倒霉了。但造反派倒霉得还没这样快。例如北师大发生97事件，一些人搞了一次政变，夺了谭厚兰的权。她的秘书还出来揭发。但中央文革很快出来保了谭厚兰，平定了局势。

9月8日，报上发表了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值得注意的倒不是对陶铸的批判，而是点名批判了“反革命阴谋组织”516兵团。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没有过的事。

人们在8月初就知道有一个516兵团，是反对周总理的。其大本营似在钢铁学院。另外北京外语学院还有一个616，似516有联系。据说他们曾写大标语反对周总理，但为人所知是因为中央文革讲话中已点名批判过。他们516的头头张红旗也被逮捕。他们的人数似乎不多。在报上点名批判是异乎寻常的。

然而，抓516很快布置了下来。因为616的头头刘令凯已被逮捕，很快有消息说，616派人来过科学院！

王力、关锋、林杰等人倒台时，我们的对立面就很高兴，觉得我们也是和他们一路的人，也应打倒。一抓516，他们很想在我们队伍中抓出几个来。

还好，领导的意思，特别是军代表的意思，还是各派自己抓。我们《红联》也成立了专案组。邹协成叫胥鸣伟当组长。他说这是因为很多人反对胥，有不少流言，这样做是镇压谣言。胥鸣伟是数学所的研究生，我在研究生院的同学。他是调干，在反右时似有点不大的问题。他脑子清楚，工作能力强。

专案组常在我所工厂开会。我也常去听。我们当然不相信我们队伍里有什么516，也不太相信他们队伍里有。那这个专案组干什么呢？

专案组调查616派人来科学院的事。这事不难调查，很快弄清楚了。是616派人来院要材料。这本是文革中群众组织常有之事。材料指小报动态报之类。他们的代表找到我院联合夺权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是从地理所来的。这个616的代表又是一名女学生。于是这个地理所的人就产生了非分之想，和人家套近乎，使这个关系比平常要材料的事还密切一些，虽然后来没有任何结果。作为政治问题也没有任何结果，因为这事很清楚。当然，如果这个工作人员是我们的人，他们一定要大做文章的。

我们听了这事很高兴，因为地理所是保守派的大本营，一贯反对我们。我们派人去院机关“外调”了他一下，但没继续做文章。

然而我们的对立面还是作文章。他们不敢找《红联》的茬，就拿《全红》开刀。当然《全红》更脱离群众，给别人抓住的问题也多。

《全红》的头头邱海平所在单位 651 设计院开大会批判邱。但实际上是院《造反团》的人在批判。实际上这不很符合当时的政策。

邱的主要问题是拥护伊林·涤西的大字报。我曾听邹协成在《红联》开会时说过这个问题。邹说，造反团开会时，邱海平曾对他说过，伊林·涤西的观点不好驳。邹协成说，有什么不好驳的？我一句话就把他驳倒了：他反对林副主席就是错的！

粟达人对当前这样干十分不满，对批判邱海平也十分不满，认为是在整造反派。听说在四不要礼堂斗邱海平，他要去参加。我怕他出事，也跟着去了。

批判会上，似乎没提伊林·涤西大字报事。邱海平站在台上，却不失风度，回答每个问题。粟达人在台下给他喊好。开完会出来，他还向我打招呼，然后在 651 一帮人簇拥下到海顺居吃饭去了。

这件事无结果而终。到了 1968 年，特别是后来“反右倾”以后，抓 516 的事就不再有人提。但这件事远远没有完。

二十一

1967 年初造反派夺权以后，我所在的业务组也成立了勤务组并开始搞业务。这个组是我们室里最大的组，任务是受控热核反应。

我所和房山的原子能所二部，即后来的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是我国最早开展此项研究的单位。我们都是 1958 年开始的。但后来，我所搞此事的课题组接受了国防任务，这项研究就停下了。1966 年在哈尔滨召开第二届全国电工会议，会上决定了分工：二机部搞仿星器，中科院搞快过程即箍缩装置。1966 年 7 月，陈春先在室里传达了会议精神。但随后文化大革命高潮掀起，这件是就搁下了。

造反派夺权后，这个组成立了领导班子，称为勤务组，就开始考虑此事。当时这个课题组称为“三线”。原因是该项研究按原定计划要迁往三线，具体说在陕西汉中。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是内迁还是不迁？另外和二机部什么关系？合并还是不合并？如果合并，政治上不合格的人怎么办？这些事本来是领导的事。但现在领导无人负责，只能我们自己想办法。我们就仿效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搞串

联，找国内同行开了两次串联会。参加会的除我所外，有中科院电工所、力学所、二机部五局、原子能所二部以及水电部水电科学研究院。无任何领导参加。京外单位如哈尔滨 503 所没参加。水电科学研究院有一个小组搞这个。他们的副部长、抗日名将冯仲云是学物理出身，对这个有兴趣，所以搞了一摊。文化大革命中冯仲云不管事了。他们就不想再搞了，后来也跟 503 所去了四川。

串联会上有一点是意见一致的，那就是受控核聚变要搞而且要大搞。但二机部中科院是两家搞还是合起来搞则意见不一致。但这个会，即使意见一致达成协议也没有用。

既然串联会得不出结论，别的生产关系问题也无人决定，我们所决定还是按照文革前的电工会议的分工来干，即决定建造一个 10 万焦耳储能的角向箍缩装置。这一装置在 1967 年动工建造，1969 年建成，并于年底在国内首次打出了聚变中子。1970 年初刘西尧曾来所参观。一些实验结果在以后发表了，并在 1978 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受奖。应该说，在文化大革命的环境下作出这样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

当时我也是这个“三线”勤务组成员之一。但非常惭愧，我具体参加的业务工作很少，后来下了农场，就完全脱离了。勤务组其他成员叶茂福、姚鑫兹等起了很大作用。陈春先当时还处于被审查的地位，基本没参与。

我们的这个工作在当时没人说不该干。所里别的工作就不一定了。有些研究被指责为脱离实际而受到冲击。特别是搞理论的七室，后来完全解散了。当时院里的主要任务是“黄淮海”什么的。

而我所我院的业务方向所受的最大冲击则来自国防科委的接收。

我院在 60 年代，为方便搞国防任务，把全院单位归为两类，分属计划局新技术局两个“口子”。新技术局由胡乔木夫人谷羽领导，上跟国防工办而不是国防科委挂上钩。下属所有跟国防有关系的单位。物理所在内。这些单位在器材供应上称 04 单位。如物理所是 04 单位 401 所。但这个 04 单位在很多地方如上海很不被买账。当时是有钱买不到东西。

文化大革命了，军队系统势力膨胀。连民航、京剧团都归了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新技术局口的单位划归国防科委似成了既定之局。

于是，在 1967 年 10 月份，就有些变化。首先是来了三位军代表，是从空军

来的。领导关系似也有些变化。有些文件是从国防科委系统传达下来的。但我们又未脱离中科院的领导。其原因是国防科委还没有决定要哪些所。直到一年后，这个问题才最后决定。有些所完全划过去，有些所一分为二，有些所又吐了出来。我们属于后者。据说国防科委想只要我所的图书馆。那当然是不能给的。

在科学问题上，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所谓批判相对论问题。这件事，起源于一个叫周友华的人。周友华是湖南的一位中学教师，热衷于批判相对论，被到那儿去串联的北航《红旗》学生发现，当作宝贝带到北京。后来他到了我所，由一位研究人员帮助他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并在我所开了两次会讨论。会议有院里主持，一些单位参加，来的人很多。

在第一次会上周友华先讲。他说，他想把毛泽东思想用在批判相对论上。毛泽东思想认为各种运动形式是互相联系的，所以，温度高的物体重量就轻。还有光速是可以超过的等等。

其他人发言。一些人支持他，一些人反对。大体上我们物理所反对的人多。科大则有人支持。院革委会委员陈小虹支持。即使反对他的人也首先肯定他把毛泽东思想用在这个问题上是很好的。

我在第二次会上发言。这会周友华本人没参加。我也只务虚不务实。那年头务实没人听。我说，我和所有人意见不同。我同意应把毛泽东思想用于指导科研，但周友华宣布用毛泽东思想不等于他真想这样做，他主观上真想这样做也不等于他真这样做了。我得不到这样的结论。毛主席教导我们，检验他是否这样做不但要看他的宣言，而且更要看他的行动。按照毛泽东思想，物质有不同的运动形态。其运动规律有这种运动形态的内部矛盾决定。热运动和引力是两种不同的运动形态。它们有各自的运动规律。它们可能有相关，但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绝对不能直接相关，像周友华所说的那样。

第二次会上，反对意见占多数。陈小虹也做了检查，认为不应简单表态。以后再没开会。周友华后来不知如何。但此事远远没有完。

问题是有些科研人员对此事感了兴趣。这些人的层次远远比周友华高，当然论证起来也没那么粗俗。但他们的基调和周差不多，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流行语言，当然赢得一些支持。他们之中很可能有些人借此机会从事被否定的理论研究。但他们之中有些人后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曲线救国”，为维护相对论而钻进

这个小组当奸细，我总持怀疑态度。总之，在否定理论研究的环境下，这个可以说离实际最远的小组成立了。他们印过几个版本的批判相对论的本子。据说后来还向几位大科学家汇报过。科学家们说，相对论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但我们每天都在用。文革后，这些人从批判相对论转为研究相对论，由于原来有基础，很快出了一些成果。

后来批林批孔的时候，有人贴大字报给刘西尧，说听说毛主席有关于批判相对论的指示，你为什么不传达？

涉及科学的意识形态问题还有一个自然科学的阶级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很简单的，但在文革前就被一些人弄糊涂了。一个可能来自权威的标准说法是：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掌握科学的人有阶级性。这种说法当然是很蠢的，好像自然科学本身和自然科学不是一回事似的。他们根本不懂所谓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是什么意思。在文革里，似乎还有人这样说，但市场不大，我没看到过具体文章。

我们在所里召集过一些座谈会。会上一些留苏的人谈到过苏联1948年的“文化革命”，即对摩尔根遗传学、化学中的共振论等学说的批判。我在文革前对这些问题就很注意。在文革中，我只在复刊后的《遗传学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是报道什么遗传育种座谈会的，说我们既不信摩尔根，也不信米丘林，我们相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这是标准的文化大革命思维：既反西方也反苏联，想创立自己的体系。但毛泽东思想究竟不是遗传学，所以说不出什么来。

然而在文革中对现代宇宙学是绝对排斥的。在什么有关自然辩证法的杂志上曾做过批判。

1975年以后，曾翻译出版过19世纪的一些自然科学著作，因为它们曾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我想现代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以及宇宙学，应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更密切的联系。实际上，60年代最激动人心的发现应是天体物理学领域的四大发现（脉冲星、类星体、微波辐射背景、星际有机分子）。我想，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和这些进展相联系，只能说这一哲学是死的，不再发展的。

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有三点，即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撇开最后一点不提，可把文革的斗争对象归结为走资派（这个简称出现得相当晚，我们从解放军农场回来后才听说，后来又出现“犯走资派错误”的说法，更不合语法）和反动学术权威两者。但实际上，在这个文件之外，还有第三个斗争对象，就是文革初期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后期的清队。文件不提，也许是一种阳谋。

在某种意义上，第二种和第三种斗争对象又可归并为一种。这后一种和前一种（走资派）的主要区别是，他们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对象，而且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而以走资派为斗争对象，而且是主要斗争对象，则是文化大革命区别于以前所有政治运动的主要特点。也许四清运动例外。所以四清可视为文革的先导。

两种敌人间什么关系？领袖和党的文件缺乏前后一致的论述。这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走资派到底是传统阶级敌人的新代表还是另一个阶级敌人？

这个问题的另一提法是：我们所说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说的是老的阶级敌人，即地富反坏右的复辟，还是新的阶级敌人的复辟？

在我们搞四清的时候，是把走资派看作传统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表。从四清运动的总体安排来看，是先解决走资派问题，即干部问题，然后团结一致，再搞“对敌斗争”，实际不把干部中的斗争对象视作敌人。而被审查的干部在检讨时也往往说，地主富农如何把他们拉过去。

然而，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一些论述，似对上述理解有所发展，如“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但对这一重要理论问题，毛缺乏统一的自洽的系统论述。这就为不同的理解和阐述保留了空间。

如前所述，在文革开始时有一个廖承志的国际形势报告，将大多数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说成是修正主义的，实际上说是复辟了资本主义。以前主要在对外政策方面对苏联进行批判。现在要在国家根本性质上予以否定。文革期间国内还翻译出版的几个日本人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表明我们认为苏联已确切无疑复辟了资本主义。显然，现在苏联新的统治阶级与十月革命所推翻的罗曼诺夫王朝无任何瓜葛。沙皇的后裔们（如果有的话）也不会对这一复辟表示任何

欢迎。显然，毛主席所虑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是指的新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对于苏联社会的定性是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主要敌人的基础。

但无论如何，两种敌人都是敌人。伟大领袖和党中央号召我们造反，即向这两个敌人造反。向两个敌人造反都可称为造反派。所以，1966年8月份，在国子监毆打老舍等作家的是造反派，说的并不错。有些学术著作将传统的造反派改称激进派，就是这一道理，因为与之对立的保守派也造反，虽然造反的对象不同。

然而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特别是造反派的名声渐渐变得不好以后，这一称呼只指那些造走资派反的人。这样称呼也自有它的道理。因为后一种斗争对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本来就不居统治地位。反对他们无所谓造反，而是专政，是镇压，或称横扫或下扫。老舍等人，表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实际上一打即倒，谈不到造他们的反。

但广义的造反派还是包括两派，即传统的造反派和保守派。所以，有两种造反派和两种阶级敌人。他们之间什么关系呢？一般说来，造反派更重视造走资派的反，而保守派则倾向于批判学术权威和镇压牛鬼蛇神。造反派认为保守派是走资派的社会基础。保守派认为造反派本身就是牛鬼蛇神。从理论上讲，造反派认为走资派是独立于传统阶级敌人的更重要的斗争对象，而保守派则把走资派看作被传统阶级敌人拉过去，而成为传统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表。所以，保守派对文革前的阶级斗争理论从质上没什么发展，或者说，不需要新的理论。而造反派若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则必然走向异端。这两派都反对、防止所谓资本主义复辟，但造反派认为，必须反对的，最危险的是新的剥削阶级上台，如苏联那样；而保守派则认为，要防止的主要还是旧的剥削阶级的复辟。

当然在事实上，谁反对谁的问题仍是很复杂的。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必须以党中央提出三个斗争对象为准。否则，你的组织在政治上就立不住脚。如前所说，北大《井冈山兵团》对知识分子好。这好有一定限度。如这知识分子被揭发出什么当时认为很上纲的问题，那只能划清界限，请君好自为之。否则救不了你，他自己也完蛋。以理想的抽象标准要求这些群众组织，只能是对历史的无知。

就造反派而言，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就我所而言，如前所述，学术上的权威有两种，一为解放前留下来的或从欧美回来的知识分子，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

时候，他们基本已不掌权。第二类是留苏生。他们绝大多数是党员，组成所谓学术秘书室，为所党委所依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二者均被否定，前者称资产阶级科研路线，后者称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当然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划分。谁也不能确切说明这些路线的含义。

所谓资产阶级科研路线，在我所批判过一些专家如副所长陆学善。但在全所未全面批判。这可能与我所上述情况有关。大家认为这些专家既然不掌权，无论出什么问题都不能由他们负责。也由于我所的一些老专家，平时作风和群众关系都很好，很少那种专横跋扈的人。

我室仅开了一次批判资产阶级科研路线的批判会。这会有一定的背景。室里两三个人，被认为是与室主任关系密切的，想开展一项称为全光（后来称全息）的技术研究。在文革前，不是领导布置，而是自己提出项目，被认为是一种标新立异的个人主义。在文革中自然也是如此看法。于是就借这个题目把这两三个人批判一通，捎带批判室主任。这两三个人都是我们一派，但远非核心，平时群众关系不太好。

但所内也有一些专家遭到可以说是残酷迫害。如从国外回来的一位女科学家，由于一些生活习惯等问题，运动初期就进过劳改队，以后又多次被批判。这和各室的情况有关。

至于所谓修正主义科研路线问题，在我室就是陈春先。他是一个很独特的人，中学毕业后赴苏留学，原学地质，后转物理（这种事当时很少见，常被上纲为“专业思想问题”），曾聆听毛泽东 1957 年在莫斯科对留学生的著名讲演。他回国后，作为一个苏联学校毕业的大学生，而非研究生，竟然得到重用，连升三级。他在文革中受到批判。这些批判也不是毫无道理的。他的主要问题是经常从一个题目转向另一题目，因而造成浪费。其中一些题目如所谓有机半导体，只是根据一些捕风捉影的资料就仓促上马，有很强的浮夸性。当然这也是当时科研作风的一种反映，不能光由他个人负责。

这都是我来所以前的事。根据我到所后即文革开始后的观察，他是个认真的人，进取心强。对他的任何批判均不能给他造成消极影响，他依然我行我素。在政治上，他在文革初期是持保守立场的，但后来很快认同于造反派。但到了 1967 年，他也提出一个研究项目。这次他是越过所里各级领导，直接找院里他认识的

人。这事被室里的人知道了，几乎所有的人都非常愤慨，说陈春先是旧病复发，又走上层路线，非批不可。于是就开了一个批判会。这会是我主持的。但实际上我是非常不愿批判陈春先的。我看不出他有什么错误。

因为陈春先的事，不但所里的人，而且在造反派内部，产生严重分歧。我们有几个人被看作陈的一党，受到一些压力。■

【书讯】

胡宗式 章铎 著

《北京大学文革史榷》（上卷）在美出版

作者简介

胡宗式，1941年生，1960年毕业于天津二中，同年考入北大物理系。

章铎，1944年生，1963年毕业于淮南一中，同年考入北大生物系。文革中，胡、章二人同在新北大公社动态组，毕业后，长期在陕西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工作。退休后，夫妇二人致力于北大文革的研究，已收集整理了数百万字的文革资料，并于2020年出版了《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上、中、下），2022年出版了《北京大学文革资料续编》和《北京大学文革研究文选》。

内容简介

《北京大学文革史榷》分上下两卷，包括序编、正编和附编三个部分，全书共十八章，70万字。本书是上卷，这一卷包括序编（1-3章），正编（4-11章）。序编讲述了文革前北大的政治运动：反右、双反、反右倾，以及1965年北大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书中叙述并分析了社教运动成为“烂尾工程”的经过和原因，以及它对北大文革的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正编叙述了1966年6月至1967年8月北大文革的历史进程，讲述了“第一张大字报”的问世，工作组的进驻与撤离，校文革的组建和运作——夺权中的表现，与吴传启团伙的斗争，以及应对校内反对派的种种措施。书中还讲述了聂元梓请李讷将王力、关锋的材料转交毛泽东，向中央文革负责人举报王力、关锋结

党营私，在“地派”六校万人围攻北大时的作为，以及聂元梓、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被中央文革持续打压的过程。



北京大学文革史权（上卷）目录

序 3	
关于本书的说明 8	
序编 不停顿的政治运动和矛盾的积累 12	
第一章 “文革”前北大的政治运动（一）：反右、双反、反右倾 13	
一、反右前的各种运动 13	
二、反右运动 14	
三、“双反”运动 16	
四、反右倾运动和批判“党内专家” 18	
附记：关于批判马寅初校长 23	
第二章 文革前北大的政治运动（二）：烂尾的社教运动 24	
一、北大社教运动的背景 24	
二、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在北大社教问题上博弈的开始 25	
三、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在北大社教问题上博弈的继续 30	
四、“二十三条”公布后，北大社教发生逆转 34	
五、在各方博弈下，北大社教终成烂尾 40	

附记：“陆平是好同志犯了一些错误”究竟是谁说的？ 42

第三章 文革前北大的政治运动（三）：对社教积极分子进行清算的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 43

一、7月整风 43

二、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的部署和第一阶段会议 44

三、三个重点系的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简述 45

四、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上重中之重的哲学系 50

附记：邓拓的厄运 77

正编 荒唐的两年零两个月 78

第四章 “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及其影响 79

一、在《五一六通知》的促动下，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 79

二、毛泽东批示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84

三、关于“第一张大字报”产生过程的争论 86

附记：关于陆平 91

第五章 “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 92

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仓促进入北大 92

二、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北大燃起“文革”烈火 93

三、“六一八事件”及工作组报送中央的两个文件 95

四、陈必陶等人写大字报给工作组提意见 99

五、张承先对陈必陶等人大字报态度的转变过程 100

六、聂元梓7.19讲话引起的风波 102

七、毛泽东回到北京，决定撤销工作组 103

八、中央文革在北大召集大会批判工作组，李雪峰宣布撤销工作组 104

九、工作组顺利撤出北大 106

第六章 北大校文革筹委会和校文革的头两个月 107

一、聂元梓的“8.5讲话” 107

二、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十六条”，北大选举成立了校文革 109

三、王任重“主抓”北大运动和哲学系左派的分裂 112

四、在“破四旧”的浪潮中，校文革号召保护文物 118

第七章 1966年关于校文革执行了什么路线的大辩论	120
一、《红旗》第13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21
二、反对派的出现，其观点和组织	122
三、支持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组织及其观点	125
四、聂元梓和校文革的态度及对策	126
五、聂元梓的两项行动：贴邓小平大字报和奉命去上海串连	127
六、大辩论的继续和“井”“红”问题	128
七、“井”“红”一意孤行，矛盾不断激化	130
八、1966年12月：“井”“红”的失败和瓦解	140
九、大辩论的尾声和对“井”“红”的清算	145
十、军训和新北大公社成立	150
第八章 1967年1、2月间，一条“黑线”暴露出来	152
一、陶铸被打倒和吴传启团伙的崛起	153
二、在“一月夺权”中，北大同关锋、吴传启团伙发生冲突	158
三、北京市的“夺权”和“北京革命造反公社”	163
四、“除隐患”想法的产生与实施	166
第九章 激烈动荡的1967年3月	171
一、“反二月逆流”狂飙中的新北大公社	171
二、校内整风和再一次分裂的开始	181
第十章 1967年4月和5月，向吴传启团伙开炮	194
一、1967年的“大方向”——彻底批判刘少奇	194
二、新北大公社向吴传启团伙开炮	195
三、新北大公社对吴传启团伙的揭发	211
第十一章 1967年6-8月，来自关、王、戚团伙的全力打压	214
一、来自中央文革关、王、戚、陈伯达的全面打压	215
二、全面打压下的北大乱局	225

【资料】

北京大学社教运动资料选载

1964年7月23日晚聂元梓向张磐石谈话

北大已经到顶头，系的工作到了最后界限，过去还容许拖拉，再往下不容许拖了，要不然这个学校就垮了。北大要办成社会主义革命大学、继承好的革命传统、真正成为国内第一流学校，还是把它搞垮，现在已经到头。要搞好就要革命，不然我也不愿在这里。这几年工作和人家比，都是比人家差，和清华一墙之隔，十年之差，很多工作无法和人家比。这里学校的领导形式主义，认为一天就能赶上人家，说自己也能教书，也能做政治工作。把做业务工作的安排做政治工作，结果两方面都丢了。学人家不是从思想上、工作方法上、作风上、一系列革命的根本办法上解决。

根本问题主要是领导思想、领导作风，问题比较严重了，十中全会的传达中说到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说起来很多，苦了！根本问题是指导思想，如何更好地贯彻主席的教育思想。要彻底解决，不仅从思想上，要从组织上变革，不是提点意见，批评一下就能解决，不做一系列变革不行。戈华来了以后也活动不开。一个、两个人从中间加也改变不了，看是什么人。

你们来得非常及时，来得已经晚了。当然现在来还是好的，来得早些更好。我的工作已经到头，花了那么多时间在人事上，看到教学、学术思想、争夺青年等大问题，不能很好抓。老是弄这些问题，心里确很着急，将来出了问题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问题，资产阶级活动猖狂，从政治思想、学术、教学、教研室工作等各方面看，资产阶级争夺青年够严重了。

领导上以为放一个老同志就放心。要有集体。我来这里以后，没有一个领导同志让谈谈系里政治思想情况。最近陆平同志才问起对阶级斗争心里有数没有，要求抓学术讨论。这两年限于上面要抓什么反映时才抓，系里也是这样完成任务。

我在上班以后抓了：①领导干部学《毛选》；②党内外阶级斗争状况；③干部问题——从思想上、组织上解决。

学校没有布置学生学习周扬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大会上的报告。没有形

成战斗的集体、坚强的核心。☞

摘自庞达同志1965年11月11日在哲学系、经济系教职员党员整风大会上的发言。庞达同志说，是根据周其湘同志的记录讲的，未与聂元梓同志核对。

聂元梓同志在去年9月24日哲学系教职员党员整风会议上发言

前一周内同调查组联系的一些情况

周其湘整理

这份材料是根据我所记的调查组大事记和有关记录整理出来的。材料中提到的有些会议是活动，因为我没有亲自参加，当时只根据间接了解的情况作了记载。

9月18日下午，张磐石同志找陆平、谢道渊、聂元梓等同志谈哲学系整风问题，提出会议要有引导、有倾向性，要抓原则问题，并且要求王庆淑同志在21日发言，指定谢道渊、聂元梓同志在学校党委正式表示意见以前，先在会上讲一讲，表示赞成什么意见、不赞成什么意见。

9月19日（星期六）下午，哲学系党总支开会，谢道渊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张磐石同志的上述意见。讨论时，谢、聂双方对“倾向性”、“原则性问题”的理解发生分歧。最后，聂元梓同志表示要请示中宣部调查组和学校党委。那天因阮铭同志另有要事，张磐石同志临时派我去参加这次会议，要我在会上催问王庆淑同志是否能按期发言，并且表示他准备来听王的发言。当晚在进城途中，张磐石同志在听我汇报总支委员会讨论情况以后，又让我在第二天一早通知聂元梓同志三件事：一是再一次追问王庆淑同志能否按期发言；二是向聂说明“倾向性”和“原则性问题”的含义；三是了解聂本人发言的准备情况。当时他还指定阮铭同志帮助聂元梓同志准备发言。

21日（星期一）上回北大后，阮铭同志就找聂元梓同志谈准备发言问题，并且研究在会上印发哪些讨论材料。在22日晚陆平同志到会上讲了今后整风部署以后，第二天上午，阮铭同志又找聂元梓同志谈发言稿。

当时张磐石同志对这件事抓得很紧，23日那天他在城里听彭真同志报告，

上午和晚上曾经两次从家里打电话来了解哲学系的动态。阮铭同志向他汇报了聂准备发言的情况和对聂的发言稿的看法，认为太烦琐，有些提法太绝对，打击面太大。张磐石同志指示不要烦琐，百分之百对立没有必要，观点要明确。当晚聂元梓同志又来找阮铭同志谈了发言稿的问题。■

【资料】

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

简报（11）1965年8月27日

会议简报组

各组讨论戈华同志的自我检查的情况

8月26日上午，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同志在大会上做了自我检查，下午各组进行了讨论。发言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戈华同志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虽有所检查，但是检查的态度不够诚恳，思想挖得不深，不敢戳自己的痛处，缺乏自觉革命的决心，没有彻底放下包袱。不少同志对戈华同志的检查很不满意，认为检查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躲躲闪闪，避重就轻，甚至表白自己，流露出冤枉、委屈的情绪。化学系总支委员华惠珍等同志说：本来我们对戈华同志检查寄予很大期望，我们在运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他相似，希望听了他的检查，能够启发我们进一步认识错误，但听了以后感到大失所望。他没有给大家树立起检查的好样板。物理系副系主任黄昆同志说：戈华同志的检查模模糊糊，思想活动讲得很不够，实质问题谈得很少，他对张磐石错误的揭发也很不够。我认为戈华同志的包袱很沉重，应下决心把它放下。历史系副教授汪篔同志说：戈华同志的检查出乎我意料的差。戈华同志作为党委第一副书记，还不如我们爽快，至今问题还未彻底解决，我感到焦急，希望戈华同志向党交心。中文系副系主任张仲纯同志说：戈华同志作为学校党和行政主要负责人，这样的检查，与他所处的地位不完全相称。他的检查思想脉络不连贯，看不出戈华同志在运动中到底想些什么，怎么想的。校一级领导同志的检查很重要，如果检查得不够好，常委问题的解决就很值得忧虑。今后北大党的日子就不好过，就要走比较长的弯曲的道路。

很多同志认为戈华同志从湖北回来以后，很快就成了张磐石同志的重要依靠

力量，紧紧跟着张磐石同志的错误指导思想走，在运动中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他对自己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认识不足，检查不够。化学系高分子教研室支部书记丁有骏同志说：戈华同志说自己在运动中只是张磐石团结争取的对象，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戈华同志后来成了张磐石依靠的重要支柱。戈华同志以党委第一副书记的身份，在运动中积极贯彻张磐石的错误指导思想，起了很坏的作用。无线电系总支书记汪永铨同志说：运动中，常委一分为二，戈华同志是一边的头，他说的话对党员干部的影响很大。我认为他对自己在运动中起的作用的危害性认识不足。

很多同志认为，戈华同志对在运动中“追根子”的问题检查、认识得很差，没有认识这一错误的实质，也没有从思想上深挖，为什么要无根据地追市委。法律系总支书记范明和副系主任肖永清同志说：追根子是个严重的问题，戈华同志检查时一带而过，仅仅归结为对市委和大学部的个别负责同志“不尊重”、“违反组织原则”，这不是问题的本质。

很多同志指出，戈华同志在检查对春节回校的四清干部讲话时，回避了许多重要的错误事实。化学系总支书记王孝庭同志说：这篇讲话，首先离开客观事实，颂扬工作队，接着对学校工作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突出地讲陆平、彭珮云、谢道渊搞阴谋活动，包庇哲学系地下总支，对抗中央工作队，说技术物理系的阶级报复案件是党委批准并直接指挥的，说陆平安排了一伙气味相投的人，实行家长统治，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干部路线，说陆平对工农干部、老干部，有的是排挤打击，有的千方百计地调走，说反右倾狠狠地打击了一批老干部，还点了好些负责干部的名。今天戈华同志对这些重要事实都没有检查，只是支离破碎地举一些例子，检查自然不深刻。戈华同志应当想想自己发言的基本精神是什么，起了什么作用。物理系副教授丛树桐同志说：戈华同志向四清干部介绍运动情况，到底是张磐石压你这么做，还是张没有压你，而你投其所好？究竟是怎么回事，应当说清楚。

许多同志认为戈华同志对自己在今年三月国际饭店会议中的错误检查得很不够。党委机关、法律系、化学系等小组的不少同志提出，戈华同志一开始就不同意召开这次会议，会上一直采取顶的态度，但在检查中没有说清楚为什么要顶，是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他在检查中谈到的国际饭店会议的情况也是不符合实

际的，机关第二总支书记庄守经同志说：戈华同志应该承认自己在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上就是顶牛。他说自己当时扭在北大有严重问题上，对许多同志否定运动成绩，不讲北大的问题和自己的问题，思想不通，所以就犯了错误，这样的检查没有如实反映那次会议的情况，对不明情况的人也没有好处。他说自己那时同意了中央书记处的精神，但又说直到民族饭店会议得知张磐石同志布置大家学习有关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文章时，才接受了北大的运动把矛盾性质搞错了的看法，这是自相矛盾。技术物理系副系主任刘元方同志说：戈华同志在检查中提到三月开国际饭店会议时，和一些同志接触中起了不好作用。在哪些问题上有什么不好影响，应作具体检查。

许多同志谈到，戈华同志对张磐石的错误揭发得不够，对自己受了张哪些错误影响也揭发很差。生物系、化学系、历史系的一些同志说：戈华同志和张磐石接触比下边的积极分子多，对工作队的一些恶劣作法，特别是分化瓦解常委会的手段，会了解得多一些，但在检查中，揭发得很少，很不具体，是否与不愿揭发自己的问题有关？是否对清理自己身上受到的张磐石的错误影响认识不够？

很多同志认为，戈华同志在检查中暴露思想不够，根源挖得不深，对自己为什么上纲上得那么快，后来又转变的那么慢，说得不清楚，检查中谈到的有些思想和错误事实不对口。化学系无机化学教研室支部书记叶于浦同志说：戈华同志检查说，他在运动中听了就信，信了就讲，讲了就坚持，为什么张磐石讲的你听了就信，中央书记处讲的你听了却不那么信呢？生物系副系主任葛明德等同志说：戈华同志在运动中跟张磐石跟得快，接受中央方针政策相当慢，为什么会这样呢？光说是认识问题是解释不通的。国际政治系主任赵宝煦等同志说：戈华同志讲自己到今年四月民族饭店会议揭发张磐石让工作队和积极分子学习关于三大战役的文件时，才看出是混淆了矛盾的性质，这是不合情理的。今年三月国际饭店会议上揭出运动中那么多的问题，戈华同志自己也追了上级领导的根子，而从大量事实中都看不出是混淆了矛盾性质，直到民族饭店会议时，才从布置学习的文件中看出这问题，让人想不通。党委研究室主任郝克明同志说：戈华同志在张子意同志谈话之后，曾劝张磐石承认错误，并说“一将无能，万将受苦”。戈华同志在检查中讲这句话时，丝毫不加分析批判，反映了他对张磐石的错误认识不够，张的错误难道是“无能”的问题吗？“万将受苦”又是什么意思呢？化学系

副系主任文重等同志说：戈华同志讲“一着不慎，全盘皆输”，这句话不是正视自己的错误。怎样叫输了呢？输给谁呢？是不是戈华同志有后悔“押宝”押输了的意思？希望戈华同志能站到党的立场上来，认真地检查自己的思想。

不少同志对戈华同志的工作提出了意见，认为戈华同志来北大后，没有把党委第一副书记的任务认真担当起来。有些同志认为这是革命责任心不强的表现。数学系总支副书记韩启成同志说：戈华同志说对工作不敢大胆抓，但是从思想上检查不够，作为一个老干部不应这样，要好好检查。技术物理系总支书记戴新民同志认为戈华同志怕把关系搞坏了，不是勇于挑起担子，把党委的工作抓起来，这里有个人患得患失。

发言的同志中有少数人认为戈华同志的态度诚恳，检查得很好。经济系主任助理盛皿说：戈华同志检查态度诚恳，内容深刻，为全体党员树立了自我批评的好样板，我很满意。他在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上的表现，正如他在检查中讲的：一是想保护运动成绩；一是认为北大问题严重。戈华同志检查得非常具体，说明戈华同志在党和同志面前是坦率的。戈华同志有许多优点，组织性纪律性强，他在党委工作中有畏难情绪，我很谅解，建议他克服。经济系总支委员李志远同志说：戈华同志的态度是诚恳的，检查得很好。他对自己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对春节前给参加湖北四清的同志的讲话后果是有认识的。戈华同志谈运动中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符合逻辑，符合他的思想实际。中文系系主任杨晦同志说：戈华同志的检查是恰如其分的。他平时讲话朴实，不夸大，不缩小，我对他的发言也有这个印象。戈华同志检查得很沉痛，他也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是在工作队指导下犯的，他没有独立的行动。君子可欺之以方，戈华同志犯错误正在这个方面。戈华同志对学校情况估计得严重，陆平同志自己的估计也是很严重的。戈华同志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正常的。

简报（12）1965年8月27日

会议简报组

哲学系、经济系小组讨论陆平同志的自我检查的情况

8月26日下午，哲学系、经济系小组继续讨论陆平同志的自我检查。

哲学系教授任继愈同志说：陆平同志的检查，真实、诚恳、坦率，对自己的错误不掩饰，不回避，真正是向党交心，向同志们交心。通过陆平同志的检查，自己对哲学系的大是大非问题更加明确了。王庆淑同志的问题是党内的问题，是好人犯错误，虽然同志们对她犯错的大小程度看法不同，但通过大家讨论总会弄清楚的。陆平同志的发言对解决哲学系的问题提供了线索，指出了道路，因而增强了我的信心。过去，在哲学系的争论中，自己把自己当成局外人，不打听，也不想参加，觉得离开哲学系就好了，这不是对党负责的态度。陆平同志在运动中受了不少委屈，精神上受到很大伤害，但他这次检查却没有个人情绪，并没有说北大是是非之地，不想干了，而是信心百倍，革命朝气十足，这是革命者的态度，我从中受到很大教育，这是值得我很好学习的。

哲学系助教张凤波同志说：陆平同志的发言，是一篇生动的阶级教育的报告，使我受到很大教育，进一步明确了几年来北大和哲学系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大是大非问题。陆平同志提到哲学系四方面的大是大非问题，基本上和去年整风期间提出的一样，但是，由于张磐石同志的错误指导思想，整风的要求和内容没有得到贯彻。当时，有一种提法说，哲学系的主要矛盾是广大党员和以王庆淑为首的特殊势力之间的矛盾，又有人说，哲学系的主要矛盾是广大党员和王庆淑的方向、道路之间的矛盾。1963年暑假整顿支部时，还有人说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的主要矛盾，是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即谢龙等同志和一般党员之间的矛盾。现在看得很清楚，陆平同志提出的四方面的大是大非问题才是哲学系的主要矛盾。

哲学系讲师徐明同志说：陆平同志在检查中说，是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是哲学系的一个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提出来很重要。冯定的问题揭发出来以后，哲学系总支领导同志在运动中对冯定的态度说明和冯定的思想界限是不清楚的，系领导对冯定参加会议批判王庆淑，对冯定竟这样和蔼，对陆平、王庆淑同志却这样无情斗争。当陆平同志提出，冯定的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应该进行批判以后，在张磐石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工作队和系领导一方面在系里散布党委阻挠批判冯定的流言，另一方面又急急忙忙主张全校停开政治课批判冯定；聂元梓同志还在动员批判冯定的全校大会上发言，影射学校党委不主张批判冯定。系总支负责同志应当很好检查。

经济系教授樊弘同志说：陆平同志的检查是诚恳的，坦直的。但没有提高到

以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为纲来检查。陆平同志在执行党的政策时，在一定程度内，不根据实际情况，不进行调查研究的，盲目执行党的政策。按毛主席的《反对本本主义》的说法，这不是真正执行党的政策，是反对党的政策，或用最巧妙的办法，对政策怠工。陆平同志在一定程度内或在相当大的程度内，盲目的无条件地执行党的政策，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1958年，陆平同志在党代会上就说过，我的缺点就是把党的政策硬灌。说“硬灌”两字时，态度挺轻松。我当时听了，对陆平同志的热烈拥护就凉了半截。我想陆平同志在北大今后必犯错误，果然，1959年反右倾，陆平犯了把党的政策硬灌的错误。陆平没认真考察河南、河北调查组报告，听说中央认为此报告是调查研究工作中的一面红旗。但是常委根据报告摘录进行批判。陆平同志盲目的无条件地把反右倾轰轰烈烈搞起来了，把许多好同志当右倾机会主义来批，来避免上级的批评，争取上级的信任，结果是非不分、敌我不分。按照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这不是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此外，陆平同志也没有认真执行党的指示，认真学习大庆、大寨，学习人民解放军。我认为我们总结工作，不提到毛泽东同志《反对本本主义》的高度来检查，将来非再犯错误不可。但是。我的水平低，上述意见可能是把《反对本本主义》来硬套。只是把它提出来，仅供陆平同志参考。如有不对，请叫支部批判。

简报（13）1965年8月27日

会议简报组

各组讨论史梦兰同志自我检查的情况

8月27日上午，党委副书记史梦兰同志在全体大会上作了自我检查。下午，各组进行了讨论。普遍反映史梦兰同志的自我检查态度诚恳、坦率、老老实实，向党交心，抓住了自己的主要问题，自觉革命精神很好。历史系副教授汪箴同志说，史梦兰同志的检查态度诚恳，真正是向党交心，内容丰富，也符合实际情况。生物系生化教研室副主任王镜岩同志说，从老史的检查可以看出他不愧为入党较早的老干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老老实实，可以从检查中看到 he 内心的一切，听起来很亲切。西语系学生党支部书记张振国同志说，史梦兰同志画自己的相画得很像。我原来对史梦兰同志有一些意见，听了检查以后也就解决了。他是一个

工农老干部，打过仗，受过锻炼，今天还犯了这些错误，我自己很年轻，又没受过锻炼，更需要加强思想改造。

大家对史梦兰同志提出了一些意见。许多同志说，史梦兰同志把问题都摆出来了，但分析批判还不够。特别是对近几年来革命意志衰退及其危害分析批判不够深刻。西语系总支副书记雷崇立同志说，史梦兰同志在入城以后滋长了一些什么错误思想，如果进一步分析批判一下，就能更有把握地克服这些错误。西语系副系主任严宝瑜等同志说，史梦兰同志对自己的问题的危害性认识还不够。他在北大负责党的工作和干部工作，北大党的队伍原则性不强，战斗力不强，和他的工作有直接关系。史梦兰同志不严格要求自己，也不严格要求别人，上梁不正，下面就会受影响。中文系副系主任向景洁同志说，史梦兰同志检查中总结经验教训还不够，有些就事论事，这样对今后提高不利。

许多同志表示热诚地希望史梦兰同志今后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振作起革命精神，更好地为党工作。

不少同志提出史梦兰同志检查贪图安逸的思想是应当的，但是，对这方面的问题缺乏分析。如笼统地把喝酒、抽烟、看电视、抱孙子说成是“和平演变”的开始，是不妥当的。

中文系总支委员吕乃岩同志说，听了史梦兰同志的检查，我感到不满意。史梦兰同志的问题是摆出来了，但谈得有些轻松，中间不时引起大家哈哈笑一阵，不像陆平同志、戈华同志检查得那么严肃、沉痛，就对一般同志要求来说，这检讨是可以的，但就一个这样的负责同志来说，这样检查是不够的，听了陆平、戈华同志的检查，对北大将来的工作充满信心，听了史梦兰同志发言就不是这样，所以使我感到失望。

许多同志认为，史梦兰同志在检查中，对北大反右倾斗争、甄别工作、干部工作、建党工作和技术物理系问题所做的分析是正确的，有助于在这些问题上澄清混乱思想。有些同志觉得史梦兰同志在检查中对技术物理系问题还没有讲得很清楚。在运动中听到的有关技术物理系的情况十分严重，希望今后进一步澄清事实。史梦兰同志摆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但论据讲的不充分。技术物理系有的同志表示不同意史梦兰同志对该问题的分析，说：“不能认为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团结问题就是技术物理系的问题的实质。”有的同志批评史梦兰同志

对该系的问题情况未弄清楚就讲。

简报（14）1965年8月30日

会议简报组

一部分小组继续讨论

陆平同志和戈华同志自我检查的情况

有些同志谈到陆平同志的自我检查使自己受到了教育和启发。哲学系前总支书记王庆淑同志说：陆平同志的发言使自己很受教育，抓住了阶级斗争为纲，检查自己在各个时期阶级斗争形势下党性的表现，抓住了本质问题，对我很有启发。对比起来，感到自己检查很不够。关于党的建设他讲得很深刻。在哲学系如何建设成为一支经得起大风大浪的党的队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961年、1962年，总支改选就暴露了党组织的弱点，在社教运动中也证明了这一点，自己没有把工作做好感到内疚，有负党的委托。陆平同志对知识分子缺点的概括，在自己身上就有所表现，我过去缺乏清醒的认识。我同意陆平同志关于哲学系的大是大非问题的分析。在这些方面，我的工作也有缺点。我愿意和同志们一起认真吸取经验教训。

有的同志继续对陆平同志提意见。经济系教授樊弘同志说，作一个领导要具备两个条件：一要有自我思想改造的经验；二是依照客观发展规律办事。1958年以来，直到社教运动以前，陆平同志没有具备这两个条件。所以，我对北大前途捏一把汗。陆平同志学习毛泽东思想没入门，不知道怎么学。1958年以来，陆平同志虽然学了不少毛泽东思想，但是，还是教条主义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同他的个人英雄主义还没有接触，所以，他个人英雄主义还相当突出。陆平学了《实践论》，可是，做事不依照客观实际，如1958年经济系跃进规划，一年要在《红旗》上发表多少篇文章，陆平同志所选拔的干部像他一样的，不只是一个两个。选拔干部的条件是工作能力，不大注意思想性和组织性。除非改正，北大发展就成问题。

二、许多同志对戈华同志做了一定的检查表示欢迎。不少人在发言中诚恳地希望戈华同志彻底放下包袱。他们说：这次整风是解决北大问题的关键时刻，戈

华同志是党委第一副书记，是解决北大问题的关键人物之一，恳切希望戈华同志以党的利益和团结为重，抛开一切个人考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不同意见和想不通的地方也请坦率地讲出来，以便经过讨论和相互批评，使全党同志首先是常委同志达到思想的真正一致，在新的基础上更好地团结起来。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钟哲明同志说，戈华同志为什么不能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我想，可能有两副架子没有放下来，一是党委第一副书记的架子，是否怕在党员群众面前做了检查而影响面子和威信。其实领导同志越严格要求自己，越能赢得同志们的信任，陆平同志就是一例。二是运动中积极分子的架子，是否还认为自己是革别人的命的？戈华同志曾对万里同志说不能各打五十大板，现在是否还这么想呢？团委书记刘昆同志说，这次会议期间，戈华同志曾说，我这个积极分子是挂名的，流露出委屈情绪。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希望能够向党交心，自觉革命。图书馆学系主任助理史永元同志说，戈华同志检查得不好，有两个坏影响：一是北大党委领导核心真正团结一致有困难，也使人丧失信心；二是给下边同志清理思想树立了样板。希望戈华同志诚恳地向党交心，彻底放下包袱。生物系、机关一总支有些同志说：从戈华同志的自我检查中看到张磐石同志给他的压力并不大，为什么他跟的那么紧，应进一步深入检查。法律系有些同志认为，戈华同志对追市委的问题检查得不够，究竟张磐石同志在这方面有什么企图，应该揭发出来。

有些同志希望戈华同志进一步检查自己在干部问题上的唯成分论观点和春节给从农村返校干部的讲话等问题。副教务长尹企卓同志说：戈华同志在干部问题上有唯成分论观点，他在1月6日党委扩大会议上讲，北大干部路线有问题，有些问题很严重的干部都掌握大权，占领重要岗位，王庆淑是坏人。以陆平同志为首来庇护这批人。戈华同志给四清干部的讲话，影响很坏，应检查有无思想意识问题。十三陵党委工作会议是戈华同志自己主持的，运动中他又说十三陵会议是整下不整上，并把责任推给陆平同志，这个错误看法应当检查和澄清。

有的同志表示自己不了解情况，对戈华同志的检查很难发表意见。哲学系总支副书记赵正义同志说：对戈华同志的检查，我很难说是好还是坏，因为不了解情况。但有些问题可以提出供他参考。他从湖北回来后，学校运动已经开展好久，许多结论已是既成事实，当然容易接受，但是在《二十三条》公布后，在国际饭店会议前后，张磐石同志的错误指导思想对他的影响究竟怎么样，讲的不清楚。

有些同志反映，戈华同志的自我检查对自己进一步认识张磐石同志的错误有启发。有的同志说：听了戈华同志的检查，感到很好，受到教育，他谈到运动中的问题对自己进一步认识张磐石同志的错误，有帮助。哲学系副系主任邓艾民同志说：戈华同志的检查使自己对张磐石同志的错误指导思想造成的危害了解更具体了，相对于张磐石同志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害来说，感到自己对在运动中所犯的 error 还认识不足。

经济系教职员支部书记杨勋同志说，戈华同志的态度是诚恳的，但没有说清楚他的错误在那里，我感到他思想上还有矛盾。他认为北大存在严重问题，而现在又强调清理运动中的问题，他对这两者的关系认识不清，所以，思想上扭不过来。是否怕别人说自己“坚持错误”、“党性不纯”，感到有压力？如果他的错误没有那么严重，就不应该勉强扣大帽子。他的检查中有好些地方没有把是非划清楚。建议戈华同志实事求是地清理，想不通的地方可以找组织帮助。

简报（15）1965年8月31日

会议简报组

各组讨论党委副书记张学书同志的自我检查的情况

8月28日下午，党委副书记张学书同志在全体大会上做了自我检查。8月30日下午，各组进行了讨论。普遍反映张学书同志的检查态度诚恳，暴露了真实思想，对自己在运动中的错误检查得较好，同时也澄清了一些是非。地质地理系办公室主任张延亮同志说，张学书同志勇于暴露思想，他的检查态度诚恳，线索清楚。物理系总支副书记曹芝圃同志说，张学书同志的检查很中肯，既检查自己的错误，又说明了情况。中文系有些同志说，从张学书同志的检查可以看出，张学书同志确实是好人犯了一些误。图书馆学系支部副书记吴呈志同志说，听了戈华同志1月30日给四清返校干部的讲话后，我认为学校里存在从铁道部来的宗派集团。听了张学书同志的检查，事实清楚了，这些干部都是经过组织手续调来的，根本不存在所谓宗派集团的问题。

许多同志反映，听了张学书同志的检查后进一步加深了对张磐石同志的错误的认识。法律系副系主任肖永清同志说，通过张学书同志的检查，可以更清楚地

看出张磐石同志是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无中生有地制造所谓宗派集团，分化瓦解党委，孤立陆平同志，手段十分恶劣。西语系教学秘书刘帼贞同志说，过去对张磐石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不很体会，听到张学书同志说对他开了大小50多次斗争会，对他施加很大的压力，进一步体会到了残酷斗争的危害性。绝对不能对党内同志采取这种态度。经济系团总支书记王茂根同志说，张学书同志集中揭发了运动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事实，使我进一步懂得了为什么要用这么长时间来清理运动中的问题，我建议领导小组组织专题揭发、批判张磐石的错误手法，以便帮助我们具体认识他的错误，增强识别、抵制能力。

不少同志认为，张学书同志的检查对自己错误的危害性和根源分析还不深入。东语系助教徐昌华同志说：张磐石同志攻击北大领导的一张王牌是干部问题，作为主管干部工作的张学书同志，乱检讨，乱上纲，助长了张磐石的错误，使他振振有词。张学书同志的错误影响是大的，应进一步认识。物理系总支委员陈雪珍同志说，张学书同志对犯错误的原因和根本教训讲得不清楚，他的检查使人感到好像就是屈服于压力，思想挖得不深。机关第二总支书记庄守经同志说，张学书同志过去抓干部工作比较事务，这次也没有很好地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检查自己对干部工作的认识和指导思想，这样就不能更深刻地接受教训；张学书同志对自己政治上的软弱性、动摇性的阶级根源挖得不深，对个人主义挖得也不够深，他平日政治上有些盲目自满，思想改造抓得不紧，希望他能及时地挖一挖个人主义的根。有些同志还认为张学书同志对自己在平日工作中的官僚主义错误检查得不够。

不少同志认为，张学书同志对有些应该澄清的问题讲得不够清楚，在运动中关于干部工作，有许多错误的说法，引起了思想混乱，张学书同志的发言中，对这些错误说法分析批判不够有力。团委书记刘昆同志说，这次运动中把执行干部政策中的一些缺点错误，夸大为执行资产阶级干部路线，排挤打击工农干部、老干部，搅得很混乱，张学书同志在检查中虽然对这方面的问题做了一些分析，但很不够，干部工作中的错误在哪里？运动中哪些搞混乱了？没有讲清楚。提拔干部是否光看他们能说会道，笔杆子硬，听话、顺手、脑子灵，没有得到澄清。西语系、法律系、党委机关小组有些同志还认为张学书同志对于到市委看档案和追市委根子的问题讲得也不够清楚。

极少数同志对张学书同志的检查不满意，经济系教职员支部书记杨勋同志说，张学书同志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个人主义还是坦白的，但不够严肃认真，对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他故意找一些运动中的错误例子，引人发笑从而冲淡了他自己的问题。张在运动中很快地、不加分析地给自己戴上帽子，现在又很快地不加分析地给自己摘帽子，缺乏具体分析。现在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认为只要不是路线错误，成绩就是主要的，这当然是对的。但是，究竟北大的干部路线是否正确？就不能以路线正确做当然的前提。而要看我们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张说北大执行了党的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干部路线，可是又说过去重视了知识分子干部有能力，积极肯干，能说会写，面对这些又没有做具体的解释。毛主席说，领导骨干应是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人，他们应当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我们是否按上述标准来选拔和教育干部呢？关于干部的积极性问题，毛主席说：“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我认为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只能按主席的解释。而一般人所说的积极性，如单纯忙于具体事务跑来跑去，准时到会，照抄照转，领导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负责任，以及为了个人的目的恭维领导者等，则不能叫真正的革命积极性、政治积极性。张学书同志说，干部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没拿出具体材料，对干部工作做具体分析。我们应当养成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的习惯，否则难以服人。张学书同志检查说自己个人主义严重，跃进时怕右，调整时怕“左”，上面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下面请示什么就回答什么，毫无主动精神、负责精神，是当官还是干革命？在他身上还是很明显的。从运动中他的错误看，说明他根底太浅。他的情况和他目前所担任的职务不相称，领导上应给他机会让他到基层去锻炼、学习。经济系樊弘同志说，杨勋同志把我说不清楚的话说出来了。几个书记都说执行干部路线是正确的，但又说对干部考察了解不够，你不了解他，怎么知道他是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张学书的说法有些自相矛盾。张学书认为根本不存在宗派主义，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依据毛泽东同志反宗派主义的思想来检查，应该问，北大调动干部时有无丢包袱的思想，如有，这就是本位主义，而本位主义是宗派主义倾向的一个表现。1963年支部整风，限制向上级的个人

主义、自由主义提意见，整下不整上，同时领导干部脱离群众也是宗派主义的表现。由此可见，张学书同志的检查是没有提高到毛泽东同志“反宗派主义”的原则来检查的。经济系讲师李德彬同志说，我认为北大在干部问题上有宗派主义，干部不团结，很大一个根源是领导上有宗派主义。这次运动中有人抱着“你过去整我，我这次整你”的态度，也是由于领导上过去对他们的做法有宗派主义。■

【读者来信】

1. 杜钧福正误

贵刊从327期开始连载我的文革回忆录。要说明的是，这一回忆录是在1990年代撰写的，后来做了少许修改，基本代表早年的一些想法，希望各界批评指正。此外，文革前的1964年北京选了一批中学毕业生到西欧留学一说（见327期），是当时听说的，近来考证为误传。特此说明。谢谢。■

2. 郭予庆纠错

读328期《记忆》于向真的《顶风冒雪呼唤春天》有两处错误，请订正。一处为33页，正文五行中写道，于父“不肯出任河南省宣传厅厅长”。在中国省级行政机关编制序列中，没有“宣传厅”的设置，只有党委机关序列中有“宣传部”设置，故此处“宣传厅”应为宣传部之误。另一处为33页，正文第十行中写道，于父“辞去司法部宣传厅负责人一职”。同样，在中央国家机关编制序列中，部、委下辖司、局，而没有厅的设置，故此处“宣传厅”，应为为党委机关序列的宣传部之误。

于向真的父亲于明曾任吴芝圃的秘书八年（见《昨天》212期）。吴资格很老，曾任毛泽东举办的广州农民讲习所学员。抗战期间，曾任彭雪枫新四军四师政治部主任。1949年后历任河南省长、河南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将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之后大搞浮夸，首创人民公社，大放卫星，最终酿成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饿死上百万人，后被免职。吴是个悲剧性人物。于父任吴秘书八年，对吴有贴近的观察和了解。如能请于向真从父亲的角度写一写他所了解吴芝圃，那将为中国当代史研究留下珍贵的资料。■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1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